

縱論中外古今

余自幼嗜讀武俠、公案和演義小說，記得剛考入初中，向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就是《水滸傳》。自己孩提時代的壓歲錢，幾乎全部用來租閱《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說唐》、《西遊記》、《包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說岳全傳》、《英烈傳》、《海公大紅袍》、《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後來又在屋裡翻箱倒櫃，把家慈的一些藏書，諸如《鏡花緣》、《二度梅》、《再生緣》、《筆生花》，也都偷偷地拿來看了。可以說，余少年時代的全部歷史知識都是來自這類“稗史”，正是它們培養了自己對於歷史的濃烈興趣，使自己投考大學的歷史學系，決定以歷史研究作為終身的職業。

雖然余素重歷史，然早年於“正史”幾無絲毫之涉獵。自己之通讀“廿五史”等，還是年近不惑之事，當時乃為研究古代南海交通、編纂《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只好狠下心來坐坐冷板凳，親身體驗“十年寒窗苦”的滋味。其實，余最喜歡瀏覽的還是各種“野史”、“稗史”，覺得它們較為親切、較有人情味。特別是身經1966-1976年的“史無前例”的歷史，余更加確信，許多真正的史實在“正史”中是絕對找不到的。中國人向被視為“歷史民族”，但在越重視歷史的國度，越易產生篡改歷史的現象，因為就算大奸大惡的梟雄也都妄圖藉此而名揚千古，至少不會遺臭萬年。一個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之職責應該是，透過歷史的顯微鏡和望遠鏡，從浩如煙海的正史、別史、野史、稗史、私史中，肯定其真實的內容，剔除其虛假的成分，以改變“正史不正”的弊端。中國古代一些史官曾不顧自家性命，堅持直筆書史，如齊之太史、晉之董狐皆良史也！故文天祥《正氣歌》頌曰“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至於太史公司馬遷更是史家之泰山北斗！古代知起居注事者也堅持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人主不得閱，蓋“史官不記，天下人亦當記之”。吾輩實當效法此精神矣。

由於自己最初獲得的歷史知識，幾乎都導源於諸種演義，故不免深受其影響。記得演義作家們曾將歷朝的一些特點引為趣談，即“漢經學，晉清談，唐烏龜，宋鼻涕，清邇邇”。後來自己乃戲加增補，謔稱為：“夏自私，商見鬼，周分封，秦夭壽，漢經學，晉清談，隋放蕩，唐烏龜，宋鼻涕，元射雕，明恐怖，清邇邇”。也有的人認為，歷史好比一個圓圈，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此種主張雖被指為“歷史循環論”，唯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以中國歷代的興亡、治亂、盛衰而言，有一句頗為貼切的俗語，亦即人所共知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語由來已久，然迄今似尚無比之更合適、更富生命力的名句了。

確實，從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起始，以至於今日，中國的一家人或一群人之統治，總是呈現由興及治、盛極而衰、禍亂致亡的規律。其間又產生長期統治的強盛王朝、為時不長的衰弱王朝、迅即覆亡的短命王朝，以及割據混戰或南北對峙諸種模式，出現了數百年一次的周期性更替。謂予不信，請看下列表解：

		夏			
		商			
		周			
春秋戰國	秦	漢	三國	西晉	東晉
		(新莽)			(十六國)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武周)	十國		(遼金夏)
		元			
		明			
		清			
軍閥混戰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表並非蓄意排列而成，而是沿著歷代之先後順序、按類似特點略加組合，結果卻表露一種相當有趣的整齊格式！

鑑於中國歷代統治的周期性更替，尤其是幾大王朝之運程，通常按照興—治—盛—衰—亂—亡的節奏而進行，我們不僅據以確定書名，而且在正文內將結合各個時期的具體情形，對此展開稍為詳盡的分析。這裏，謹先勾劃出一個大致的輪廓，以期引起大家的關注與批評：

(甲)興

篡奪政權：夏，新，魏，西晉，南朝，隋，武周，五代，北宋

貴族革命：商，西周，唐

遷都重建：東周，東晉，南宋

兼併統一：秦，西晉，隋，北宋，元，中華民國

平民起義：西漢，明，太平天國，現代

中興復辟：東漢，唐

異族建國：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北朝，遼，金，元，清

民族戰爭：明，中華民國

(乙)治

共主政治：夏，商，周

封建諸侯：商，西周，西漢，西晉，明

創制改革：夏，西周，秦，新，隋，武周，近現代

中央集權：秦，漢，隋，唐，北宋，元，明，清，現代

嚴刑酷法：商，秦，隋，武周，明

無為而治：西漢

休養生息：西漢，東漢，唐，明

文字之獄：秦，明，清，現代

殘殺功臣：西漢，明，太平天國，現代

變法維新：戰國，新，北宋，清

強幹弱枝：宋

重文輕武：宋

重武輕文：元

民族壓迫：元，清

君主極權：宋，明

特務統治：明

政黨專政：現代

元首獨裁：現代

(丙)盛

太平盛世：漢，唐，明，清，現代

勵精圖治：西周成康之治，西漢文景之治，東漢光武中興、明章之治，隋代開皇之治，唐代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武周之治，明代永樂之治，清代康、雍、乾之治

廣事建設：秦，隋

文治輝煌：西周，西漢，東漢，唐，武周，北宋，明，清

武功彪炳：秦，漢，隋，唐，元，清

版圖廣大：秦，漢，唐，元，明，清，現代

(丁)衰

列國紛爭：春秋戰國，三國，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宋遼金夏

都城殘破：西周，新，西晉，北宋，中華民國

偏安對峙：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宋金

地方割據：東周，東漢，唐，中華民國

貧弱不振：西晉，北宋，南宋，清

(戊) 亂

宮廷淫亂：夏，商，周，西晉，隋，唐，武周

女人干政：西漢，西晉，唐，武周，清，現代

國君流放：夏，西周，西晉，北宋，南宋，元，清

宗室內戰：東周，西漢，西晉，元，明

兄弟相殘：秦，魏，隋，唐，北宋，清

子女弑父：春秋戰國，隋

外戚擅權：西漢，東漢，北朝，唐，武周，南宋

宦官亂政：秦，東漢，唐，北宋，明

朋黨之爭：東漢，唐，北宋，明，現代

權臣作亂：西漢，東晉，南朝，南宋，明，清，現代

藩鎮叛變：唐，五代十國

軍人混戰：東漢，唐，五代十國，中華民國

(己) 亡

臣子伐君：夏，商，春秋戰國，隋

異族入侵：西周，西晉，北宋，遼，金，南宋，明

迅即覆滅：秦，新，西晉，隋，元

民變四起：秦，新，東漢，隋，唐，元，明，清

將相篡權：西漢，東漢，魏，東晉，南北朝，唐，五代十國

別國兼併：春秋戰國，蜀，吳，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

民族革命：元，清

*

*

*

自上面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代在興、治、盛、衰、亂、亡諸方面，往往有大同小異的類似情形。不過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它在迂迴曲折的過程中，可能會顯露這樣或那樣的雷同現象，但絕不會是對過去的簡單重複。從表面上看，中國在數千年間的歷史，表現為歷代王朝興替更迭的一連串過程，似乎一成不變。然實際上卻像螺旋體那樣，一代接一代而不斷盤旋前進。因此，我們對歷代的治亂、盛衰、興亡，不可只作單純的類比，而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與深入的研究。更有進者，我們不可只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作坐井觀天的學究式空論，而應該立於世界歷史的高度，對中外古今之歷史演變，展開比較性的探索與研討，求同析異，以便引出有益的經驗教訓，供後人作為鑑誡。

中國的“歷史之父”司馬遷有云，其撰著《史記》之宗旨乃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豪情壯志實值後輩歷史學者永遠仿效。余雖不才，難望太史公之項背，唯卅載以來在教授、研討中西歷史的過程中，年深時久，日積月累，亦略有粗淺之體會，深願於此將部分愚見貢獻出來，就教於四方之歷史大家。這些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下列方面：

(一)文明：漢語“文明”一詞本含有文化昌明、發達之意，但在世界史中通常把Civilization譯成文明。此語源自拉丁文Civis，原意為公民或居住城鎮者，後引申為人類創造文字、建立城鎮後所達到的比較進步的文化。關於文明的定義雖然見仁見智，唯論及人類數千年前之步入文明時代，其含意大致是：(1)人們已懂得利用文字記事；(2)人們已學會製造金屬工具；(3)人們已建立城鎮，過起都市生活；(4)人們經常帶著商品從事陸、海路貿易；(5)人們已建立法律和宗教，有

國家政府保護其生命財產安全。根據此種標準，世界歷史上的早期文明中心主要有亞、非兩洲的新月沃土、埃及、印度、中國，以及歐洲的希臘、羅馬。其中東方的文明較為古老，由於它們發源於兩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尼羅河、印度河與黃河等流域，故被稱為“河川文明”，後發展為“大陸文明”。而希臘、羅馬則是西方文明之淵藪，由於它們瀕臨地中海，缺乏源遠流長的大河，因而被稱為“內海文明”，後乃發展為“大洋文明”。時至今日，西方的文明程度優勝於東方，而原來文明發展越早的國家現在反而越落後。或謂“河川文明”屬於農業文化，利於耕稼，但孤立、保守；“內海文明”屬於商業文化，便於貿易，且開放、進取。此說究竟是否東、西方文明此消彼長之主因，而“大陸文明”與“大洋文明”在未來孰先孰後、孰優孰劣，均頗發人深省。

（二）社會：關於人類所經歷的社會形態，現在一般都認為人類曾度過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年的原始公有社會，及至數千年前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才逐漸進入私有制的社會。中國古代把前者稱為“大同”之世，將後者謂之曰“小康”之世。《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後世之志士仁人一直致力於重建新的大同社會，南海康有為先生並曾撰《大同書》，希望實現“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之世界。至於西方各國，亦出現類似之理想，如英國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意大利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的“太陽城”，以及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nit-Simon, 1760-1825）、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等人的社會主義。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derich Engels, 1820-1895）曾將聖西門等人的主張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認為這些“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

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其實馬、恩自己本身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方興未艾之際，即匆忙武斷地預言它即將覆滅，而其弟子列寧 (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 更迫不及待地錯誤宣稱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垂死”的階段。

不過在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以馬克思、恩格斯之體系較為完整。其中心思想之一乃通過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過渡到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設想的實現共產主義之前提條件，大致有：生產力高度發達，產品極大豐富，私有制消滅，社會道德極為高尚，勞動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人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類的身、心得以全面發展，三大差別 (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和體力勞動差別) 泯滅等等。後來列寧並具體地提出，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全國電氣化。然以今日世界先進國家美國及西方的一些福利國家來看，馬克思、列寧所期待或設想之諸般標準似均已超過或達到，唯私有制之消滅卻未見端倪而顯得遙遙無期。竊謂私有制之被取代或亦可能，唯絕非通過甚麼暴力革命所可完成，更非短時期所可實現。蓋人類由無家庭至有家庭，至少經歷了數十萬年，有了家庭方始出現私有的家產、家天下……而將來人類私產、私有制若取消應亦在家庭消滅之後 (關於此問題容稍後另行論列)，而不會在此之前。這種人生產人的革命，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恐怕不會亞於人生產物的革命，並且將經歷很長很長的時間。

(三) 經濟：人類自古迄今究竟經歷多少種社會，學者之主張向來言人人殊，或以階級分，或以經濟分。前者如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必經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包括其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後者則往往提到狩獵社會、農耕社會、游牧社會、商業社會、工業社會等等。敝人原無意充當人類命運之預言家，更不敢以救世主自居，然在撰寫《中國宗教史》時頗有感觸，曾於拙著中云，“從歷史上看，既有奴隸的宗教，也有農民的宗教或工人的宗教，其出發點都是建立一種‘平等王國’或‘共產社

會’。雖然這種理想並未實現，但人類是否注定無法達到真正的平等，目前尚難斷言。吾人曾見過‘有力闖蕩天下’（靠狩獵維生）、‘有權橫行天下’（以農業為本）、‘有錢旅遊天下’（依工商運轉）等幾種社會形態，也許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人世間終於出現‘有才名聞天下’（憑科技推進）乃至‘有理走遍天下’（按正義判斷）等社會的奇跡。這豈非老子、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馬克思們早就應許大眾之諾言？屆時‘善哉’、‘南無阿彌陀佛’（Namas Amitabha）、‘阿門’（Amen）、‘色蘭’（Salam）、‘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e）之聲或將響徹雲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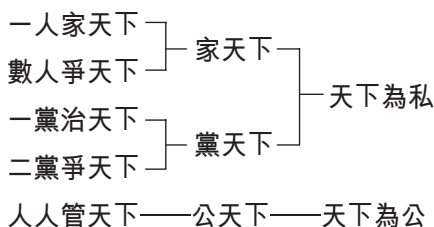
中國民間常將不同經濟地位或不同職業的各界，稱為工、農、兵、學、商。從人類經濟的發展來看，這五界在歷史上的某個階段均起過或將起到主導作用，試觀下表：

狩獵社會：有力闖蕩天下（弱肉強食）	— 強權	兵
農業社會：有權橫行天下（強權政治）		農
工商社會：有錢旅遊天下（金錢鑽營）	— 智慧	工
科技社會：有才名聞天下（科學至上）		商
正義社會：有理走遍天下（自由博愛）	—— 公理	學 民

茲略加銓析：(1) **狩獵社會**：最初人類依靠簡陋的工具來對付自然界，尤其是兇猛的野獸，強健有力的身體是極端重要的。故勇武之士受擁戴，其中有才幹且公正者成為領袖。後來權勢雖已轉移到帝王之手，但“歷史由勝利者來寫”、“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等等，仍受此種武力強權的極大影響。至於武俠小說中的“武林”社會，則充滿對以武稱霸的回憶。(2) **農業社會**：人類自畜牧社會而跨入農業社會，私有制已產生並逐漸發展，權力的中心操於經營農業的地主或封建主手中，而歷朝帝皇乃為他們之代表。在這種社會，有權便有了一切，而由於廣大農民之愚昧，則專制、強權、官僚統治必然大行其道。爾今東方諸國大多仍停留在這個階段。(3) **工商社會**：又可分工業社會、

商業社會等兩個階段。從西方來看，產業革命後，由地主脫胎而出的工廠主曾經以優越的機製品向世界擴張，其勢力一度風靡全球。後來隨著資本主義之日趨壟斷，托拉斯、金融巨頭之出現，過去令人歧視、四處兜售的商人逐漸取代了工廠主的地位。所謂帝國主義的出現，正是由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之過渡。爾今商人已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在工商社會，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的鑽營雖不免被某些人視為“邪惡”，然它已非純由強權所致，在許多方面需要運用特殊的“智慧”（包括投機取巧等等）方可奏效。(4) **科技社會**：當金錢泛濫成災、財富遍地橫流時，人類會不會過渡到以“士子”為中心的科技社會，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讀書人雖一向自視清高，然從來都像皮上毛一樣，依附於武人、國王、地主、工廠主或商人，充當“文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世界越來越需要發揮智慧的力量，而科學家的作用亦越來越受到重視。試想，在一次航天的飛行試驗中，千萬工作人員屏息以待總設計師、工程師的命令，一秒之差即足決定事業之成敗。科技界如是，而未來的世界呢？(5) **正義社會**：人類一旦由最有智慧、最具才華者來領導，則應已距數千年來無數先輩夢寐以求之“大同社會”不遠矣。彼時社會前進的動力為何？殘酷的競爭似可摒除，然絕不會是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流行，屆時或有一種受“公平規則”制約的競賽出現。關於此點，容後另述。

(四) **政治**：所謂政治即國家政權對於民眾之統治。自從私有制產生迄今，東、西方各國已經歷數千年的各種類型的治理，其方式也越來越進步。概括說來，人類政治之模式大致沿下列之順序而更替：



在中外各國歷史上，都長期存在天下為帝王一人及其家族私有的時期，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擁有至高無上之極權，他死後由兒子或兄弟繼位。如果帝王沖齡即位，則由太后垂簾聽政或由親王、大臣攝政。倘若這一家人的統治腐敗透頂，社會病入膏肓、民不聊生，則有異姓起而取代之，於是形成了諸朝興替之綿長歷程。這種“家天下”比起原始共產社會來，無疑是個進步，但經過數千年之實驗，也漸漸顯出“天下為私”的不公正之邪惡本質，於是逐步為另一種“黨天下”（誠如儲安平先生所云）替代。

近代以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展，共和政治逐漸戰勝帝王專制。然名為共和，卻非由民眾全體來治國平天下，而是由以政黨形式出現的一群人，取代以家庭形式出現的一家人來進行統治，亦即由“家天下”過渡到“黨天下”的格局。中國古代對黨派殊無好評，常謂“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主張君子“群而不黨”，蓋彼時天下為一人、一家所專有，自不容他人組成小團體或宗派而加染指。至近代之歐、美，王朝政治既已壽終正寢，政黨政治乃應運而生。一旦某政黨執政，則該國之政策即由其決定，權益亦歸其主持分配，天下乃屬於一群人組成的一黨所佔有。然同為“黨天下”，東、西方行之也不盡相同，西方以美、英為代表採取多黨制（實為兩黨制），即由諸黨輪流坐莊或利益均霑、平分秋色。而東方國家如蘇聯、中國等，則實行一黨專制，黨等於國、黨高於法，只有入黨方可作官。平心而論，“兩黨制”必然優勝於“一黨制”，因為多黨多競爭、多許諾，好比兜售商品，各家公司都誠惶誠恐地懇請民眾採用自己的產品，奉行“顧客永遠正確”之箴言，故人民就多一分選擇、多一分力量，不致沉入一潭死水。相信有一日，“選民永遠正確”將成為一切政治家的座右銘。但不論如何，“黨天下”畢竟還是難免“天下為私”的敝病，西方的兩黨制尚有待改善。至於中、蘇等國為何由一人專制的家天下轉為一黨專制的黨天下，西方諸國卻直接過渡到兩黨競爭的黨天下，可能與本國原來的專制傳統濃淡、經濟發展遲速、思想解放大小等等有關，此誠非

三言兩語所可說明。

(五)體制：中國與西方各國在相當長時間內，“家天下”之格局則同，而政治體制實異。以歐洲來說，其面積與中國大同，但卻分成三十餘國。在歐洲歷史上，也多次出現比較集中、統一的大帝國，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等，但總的趨勢是分裂為眾多的民族主權國家。可以說自羅馬帝國滅亡之後，西方世界幾乎再也沒有實現過政治上的統一了。反之，中國的歷史傳統和主流是維持一個龐大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而地方割據、列國混戰之局面則比較少見或為時短暫，直至今日依舊如此。誠然，中國在夏、商、周時期，名義上雖為統一國家，其實王權對於各地之控制力極為有限，故商、周均行封建諸侯，依賴諸侯國來屏衛王室。到了東周，更公然出現諸侯爭霸、列國混戰的格局。春秋、戰國時的形勢，實有類於希臘的城邦分治或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割據。不過自公元前221年秦一統六國以降，中國就開始形成為統一的中央集權大國，並大體沿襲了兩千餘年。中國之消滅封建割據、加強帝王權力、形成統一國家，比西方各國要早得多。而這種中央集權的大國體制，後來一直成為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阻礙。歐洲各國直到中世紀末，才出現消滅封建割據的趨勢。建立統一集權的民族國家，不僅是國王、而且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因此，我們在使用“封建”一詞時要謹慎，否則容易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與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制混淆起來。總之，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是：早就消滅封建割據，長期保持大國狀態，高度實行中央集權。而西方君主剛剛想加強集權，資本主義已經興起，王權從此式微，以後遂大力推行地方民族主權國家之體制。

昔日余在拙著《國史綱要》中，曾因評價秦始皇而涉及上述問題，發了一通議論，茲略加引錄：“中國是如春秋戰國時那樣維持‘小國寡民’好，還是成為秦以後那樣統一的中央集權大帝國好？這是鑑於近代以來中國的集權、專制束縛了它的發展，而歐、美卻因分治而各自走向富強，故有此一問。不過，中國的現代是中國的古代的必然

發展，中國之成為統一大國確實締造了古代輝煌燦爛的文明，也確實造成了近代長期的貧窮落後，但不知將來會給中國及其人民帶來些甚麼”。

(六) 法律：近來人們經常熱衷於討論“人治”或“法治”的問題。所謂“法治”，指的是以法治國，即嚴格執行國家制定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例外，不得徇私。至於“人治”，則指人高於法或黨高於法，國家法律缺乏權威，可以由大官們個人隨時任意解釋或篡改，統治者及其親屬可以犯法而不受制裁。本來在“家天下”的時代，帝王本人就是最大的權威，“朕即國家”是流行之口號。不過即使如此，帝王也希望制定一些法律使臣下共同遵守，並盡量做到“公正不阿”、“嚴明無私”，以便全國民眾均能循規蹈矩地安居樂業。在這一方面，東、西方歷史上曾出現了各自不同的傳統，其影響於今至深至鉅。數千年來，中國由於長期實行中央集權，廣大民眾愚昧無知，故官僚統治、專制主義得以大行其道，政治極端腐敗，徇私舞弊、執法犯法層出不窮。誠然，一些改革家也曾致力於法治，如戰國時秦之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主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結果商鞅致秦富強，自身卻亦被“車裂於秦”。暴秦覆亡後，法家思想被儒家思想所取代。自是以降，歷代統治者口頭上均大講“禮治”，滿嘴仁義道德，實則男盜女娼。所謂的“仁政”，正是掩蓋“無法無天”的幌子。於是出現了種種政治笑話，例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又如某些最高法律規定某種機構擁有國家最高權力，但又規定它必須接受某種團體之領導，結果國家必然受此團體最高領導人之支配與統治，法律不過是一片遮羞之布。

和東方相比，西方較有法治之傳統。追根溯源，歐、美諸國的法律均受古羅馬法之深刻影響。羅馬曾是一個奴隸制的國家，它的法律自是鎮壓奴隸、不利平民而保護貴族的，然因平民之鬥爭，使國家頒佈《十二銅表法》，將法律公諸於眾，後來其法律體系和內容越來越完備、充實，具有詳盡、明細、嚴正等特點。而隨著奴隸制之廢除，

羅馬法更加體現出一種精神，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梁任公對羅馬法曾推崇備至，謂“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為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新史學》）。今日歐、美各國法治社會拜羅馬之賜實莫大焉。或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同在金錢或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樣，均為不可能之事。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國家法律之階級性，然如能提倡平等，使人人有法可依、有律可循，至少可以增加民眾手中的鬥爭武器，只要他們提高文化知識，即不易受人蒙騙。這起碼比那些表面上宣稱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要“為人民服務”，實際上為一己一黨之私利而罔顧法紀、草菅人命的做法，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七）自由：自由自在指能按己意行動而不受限制，包括自主、任意、舒適等義。但不同時代，自由的概念和程度亦不盡相同。在古代之羅馬，奴隸們從被束縛、虐待、壓迫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即意味著自由。中古、近代之交，農奴們擺脫領主的佔有，成為可以任由資本家僱傭的勞動力，也可謂之曰自由。“自由、平等、博愛”以及“不自由，毋寧死！”等，曾是近代法國革命之響亮口號，它們意味著“個性解放”、“人身自由”、“政治自由”乃至“貿易自由”等等。時至今日，一個國家之人民是否自由，而各國自由程度之高下如何，已有一些相當具體的標準可供衡量，例如言論、通信、新聞、出版、信仰、遷徙、結社、集會、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等等。它們如能得到法律之保障並切實地履行，就算真正地實現了自由。目前西方各國之自由程度遠遠超過了東方。蓋一個國家能否為民眾提供較多的真自由，視乎該國政府有否強者之信心，不怕人民隨意造反，而其基礎則在經濟之發展、文化之普及和文明程度之高尚與否。以亞洲而論，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在經濟上被稱為“四小龍”，其民眾所享有之自由亦高些（不計日本在內）。而香港實可謂國際華人社會中最自由之地方。

當然，人類之自由必有限度，世上並無絕對的自由，人們決不可能做到“想做就去做”。以自然與人類的關係看，許多天災、疾病是不可能被克服的，人的行動不能超越其肉體（包括頭腦）所能允許的界限。就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看，每個人的自由不能妨害到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故須受社會法律的制約（有時還會受到一些輿論的影響和道德的約束）。就這些意義而言，自由可理解為對必然的認識和對社會的尊重。長期以來，人類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一方面不斷地向自然鬥爭，例如通過體育競賽來提高自身的速度、靈敏、耐力與體力，並配合以衛生保健來延年益壽，通過發明各種舟、車、飛機、火箭向海、陸、空進軍。另一方面，不滿社會現狀的人們亦經常發動各種變亂、暴動與革命，企圖廢除現行之法律，制定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準則。而統治者往往也以一些增加自由的許諾，來緩和民眾的反抗情緒。故“自由”幾乎成了各界人士高談闊論的口頭禪，誠如法國羅蘭夫人所云，“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總之，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愈富強、愈開明，就愈能准許民眾獲得較高的自由，否則往往會千方百計地欺騙乃至鎮壓民眾。凡是強者、優者多主自由開放，英、美在歷史上曾以提倡“自由貿易”、“門戶開放”而馳名全球，不過一旦某種產品遇到競爭對手也會高掛“免戰”牌而實行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稅政策。西方各國規定遷徙自由，在其國內確實如此，但卻不准外國人隨意遷入，以分其“一杯羹”。我們應以能夠提供給民眾的自由之種類多寡、程度大小及其真偽，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之優劣，捨此實不宜有別個標準。

（八）民主：人類之自由固不易致，而民主則尤難實現。民主自然是指由民眾當政作主。在私有制的社會，有錢有勢的是少數，至於“家天下”的情況下，更是君主寡人政治，故由大多數人來當政談何容易。不過在“家天下”尚未完全確立之際，以及近代議會制通行之後，或者某些國家的某些時期，出現某種程度之民主則有其例。或謂中國古代的堯、舜“禪讓”，係一種原始的部落民主制，此處暫置而不論。

一般公認，西方各國早期的民主淵源於古希臘。希臘的地理環境決定其初期之國家形式為城邦制，每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家，而各國所採取的政治體制亦多種多樣，如君主政治 (Kingship)、貴族政治 (Aristocracy)、寡頭政治 (Oligarchy)、僭主政治 (Tyranny) 及民主政治 (Democracy) 等等。其中雅典實行了民主制，並曾出現了一個黃金時代。當時雅典的自由民根據憲法可以掌握國家的政權，雖然廣大平民最終還是受貴族階級領導，但是雅典公民的參政權確實是相當大的，他們可以在街頭或廣場上自由發表自己的政見，頗有百家爭鳴之意味。雅典的民主制為時不長，且有不少弊病，唯其精神對後來西方的政治影響頗大。比起斯巴達等的寡頭政治、後來羅馬的帝制以及東方的中央集權制，雅典的民主政治仍不失為較理想之體制。

近代以來的民主主義，主要指議會制和公民所享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其他自由權利。但是通過憲法規定一些民眾的自由權，比較容易做到，而要真正實現人民當政作主，確實非常困難。如果人民普遍的文化水準不高，選舉、被選權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種裝飾物，是議會民主的屏風。在黨天下的體制下，無論一黨專政或兩黨競爭，黨派利益總比國家和人民利益被優先考慮，一些政治家為了當選或連任，也會作出騙取選票、出賣良心的勾當。環顧當今之世，民主政治之程度可能有高下之分，但確實沒有一個國家是真正實現了民主主義的。職是之故，人們經常講，現代許多國家“有自由而無民主”，並難免發出“何處是樂土”之歎！

(九)階級：從世界歷史上看，自古迄今，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之懸殊，各個時代均出現過一些相互矛盾或對立的階級。例如，奴隸和自由民，平民和貴族，農奴和領主，農民和地主，工人和廠主，店員和老闆。另各國還有一些不同的等級及特殊的名目，如中國周代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西方的公、侯、伯、子、男爵，印度的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等種姓(即Varna)及不可接觸的賤民，蒙元時代的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等等。有時一些

國家的某種階級，其名目略同而實際地位則異，如古代西方有貴族、平民與奴隸，奴隸解放後就成為平民亦即自由民。而中國西周後之平民，表面上人身自由，實則比奴隸強不了許多。倘若我們認真觀察自西周至西漢的權力中心之變化，便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掌權之階級依次遞降：(1) 西周：天子為天下之共主；(2) 春秋：王權式微，諸侯爭霸，政由方伯；(3) 戰國：諸侯卑弱，政在私門（即卿大夫），陪臣執國命，士和布衣興起；(4) 秦漢：平民勢力進一步抬頭，出現首次平民革命並取代貴族而成為國君。

論及階級，有一個問題須加辨析：如何判定各個歷史時代之中心力量？《左傳》襄九年載，“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孟子》則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滕文公上〉）。此論嘗被批判，並代以只有勞動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而馬克思主義則逕謂產業無產階級乃當前世界之時代中心力量。其實若據歷史的發展來加以檢驗，孟子之語實不無道理。我們不能否認奴隸、農民、工人們在創造物質文化方面的貢獻，也不可抹煞他們對於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然而數千年來毋庸置疑的事實是：貴族、領主、地主、工商業主總是居於統治地位，而他們這種地位之形成亦非倖致。蓋欲統治天下或領導群眾，非有才華、智識不可。歷史上的統治者大多自幼接受良好之教育，復致力於研究統治方法，即使其本人係由草莽英雄出身，亦須依賴一批“學而優則仕”的官吏來駕馭民眾。相反，廣大的勞動者每天日間要從事沉重的體力工作，夜間精疲力盡唯知休息，哪有時間來提高文化、鑽研治術。在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看得更加清楚，普通工人由於分工每天只重複完成某道工序，而工商業主既專門學過管理方法，又終日研究如何使資本增殖，故工商企業之領導重任非他們及科技人才莫屬，他們對產品的製造實凝注了自己的一份重要貢獻。中國大陸在文革十年動亂期間，曾嘗試由工人、軍人來領導學校和科研機構，結果鬧出許多天大的笑話，萬千知識分子以沉默的抗議或不合作主義來表明，只有他們才是學校及科學院的真正主人。那麼未來呢？如果

敵人設想的“有才名聞天下”的“科技社會”果真到臨，則不唯工人、工業家，就連當今紅極一時的商人，也將讓位給名副其實的“勞心者”，屆時天下將唯有才者居之！

（一〇）民變：自從人類進入私有制以來，無論處於何種社會形態，大率皆由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的下層百姓。而民眾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由無地、無權、無錢變成有產、有勢、有錢，總是不斷發動變亂，冒天下之大不韙揭竿而起。在西方，著名的如古羅馬的斯巴達克（Spartacus，？-前71）奴隸起義，法國的扎克雷（Jacquerie）起義，英國的瓦特·泰勒（Wat Tyler，？-1381）起義，德國的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沙皇俄國的拉辛（Stepan Razin，約1630-1671）和普加喬夫（Yemelyan Pugachov，約1742-1775）起義，以及近代的荷蘭、英國、法國、美國、俄國革命等等。然而綜觀古今世界各國之歷史，民變次數之頻繁、規模之巨大、歷時之持久、人數之眾多、範圍之廣闊，當以中國為最。其中有些民變居然實現了改朝換代之目的，或至少攻陷王都或奪得半壁江山，例如秦末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事，新朝的綠林、赤眉以及劉玄、劉秀起事，東漢的黃巾暴動，隋末瓦崗寨等的暴動，唐末的王仙芝、黃巢起事，元末的白蓮教以及朱元璋等的起事，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起事，清代的太平天國以及辛亥革命運動等等。

一般說來，世界各國之民變對歷史雖有其推進之作用，但具體問題尚須具體分析。一次民變對社會有否推動作用以及推動作用大小，端視變亂對社會生產、民眾生活之影響，捨此恐無其他標準。為此，必須比較下列三項：（1）變亂前國家經濟狀況與人民生活水準如何；（2）變亂所引致的戰爭對社會的破壞程度多大；（3）變亂後的政局或新建王朝對發展生產、改善民眾生活是否有利。經過一番加減乘除，憑得出的正數或負數、大數或小數，方可判斷、衡量是次民變的作用。我們不能盲目地認定，凡是農民戰爭就一定推動歷史前進，凡是變亂規模越大對歷史推動力就越大。因為我們切不可忘記，中國歷

史上民變的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所以世所罕見，只是說明中國王朝專制統治極端強大，須比別國有更大的反抗力方能推翻一個王朝。而無數次激烈的大規模農民戰爭，也只是帶來天下易姓的改朝換代，如此而已，豈有他哉！誠然，凡是出現民變的現象，多半發生在某一王朝病入膏肓之際，民不聊生乃鋌而走險。一旦發生民變，必然導致數年或數十年的戰爭，而有些暴動參加者又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擄掠，這對社會、民眾自不免帶來相當的損失。故倘若戰後的政局或新建的王朝對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不能補償過去的破壞，則對是次民變作用的估計似應打些折扣了。

此外，一次民變規模越大、越激烈，其後所建之王朝往往也越長，如漢、唐、明、清是。但這究竟是好是壞，也不可一概而論。蓋民變爆發之初，自為推翻腐朽的舊王朝或消滅軍閥割據，一旦達成目的常常演變為參加民變的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逐鹿，它們為了一家、一群人的私利繼續將民眾拖入漫長的戰火之中。到了爭權奪利告終，全國民眾早已奄奄一息，而新的統治者卻攫取了用老百姓九死一生的代價換來的勝利果實，並且維持數百年之久。由此可見，民變果實之收穫者在戰前可能嚐過千辛萬苦，經歷千難萬險，然他們的受苦受難不過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一再翻版，絕非他們自我標榜的為人民打天下。朱元璋出身於鳳陽，長期以來《鳳陽花鼓》詞常唱道：“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看來朱元璋並未給故鄉民眾帶來太大的好處。無數民變根據地的老百姓，曾千方百計地掩護、支持起義的領導人，用“小車”推出一個新“天下”來，一旦起事成功，後者進城享盡榮華富貴，前者依然過著千百年來牛馬不如的生活。這種沉痛的教訓，不是歷歷在目嗎？！

（一）革命：古代以王者受命於天，故凡君王易姓、改朝換代都謂之“革命”，意即天命之變革。《易經》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除了成湯伐夏、武王克殷外，後來武則天的建周代唐等，

也都被稱為革命。近代以來，伴隨家天下之消滅，革命的概念使用更加廣泛，包括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變革，如社會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產業革命、技術革命等等。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革命”，大致有數種：(1) 貴族革命：如商，西周，唐；(2) 宮廷革命：如新莽，魏，晉，南朝，隋，武周，五代，宋；(3) 平民革命：如漢，明，近現代；(4) 民族革命：如五胡十六國，北朝，遼，金，元，清，近現代。關於這些我們將在後面結合正文詳加論述。此處僅就世界歷史上，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革命問題，稍稍發表一點淺見。

拙以為歷史上各國均面臨過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然其發生有先有後、歷程有長有短、規模有大有小、解決有快有慢，而差別之出現乃決定於各該國的舊有封建主義 (Feudalism) 統治之強弱。饒有興味的是：以世界之地理位置來看，各國之封建專制統治由西而東大致呈現愈來愈強的狀態，而反封建之革命也相應地愈來愈發生愈晚、時間愈長、程度愈烈、完成愈慢。謂予不信，請看下列數種典型：

1. 美、英、法：每當提及封建制被資本主義取代的曲折道路時，人們通常援引英、法之例子，謂革命從爆發到取得決定性勝利，兩國各自花費了半個世紀或四分之三世紀。英國革命始於1640年，經過兩次內戰後，於1649年將國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25-1649) 送上斷頭台，並建立共和國。不久卻發生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 (Stuarts) 復辟，連已故的革命領袖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亦難逃削棺棄屍之厄運。直至1688年光榮革命，資產階級足足用了四十八年時間才確立了自己的政權。正當英國革命熱火朝天展開之際，英吉利海峽彼岸歐洲大陸的法國封建專制卻達到頂點，中央王權空前強大。為了戰勝龐大的封建國家機器，法國的革命需要更長時間的醞釀，而在英國革命勝利一百年後方始爆發。是次革命能量積累甚大、階級衝突至烈，然從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 (Bastille) 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的八十六年之內，法國仍須經歷1830年七月、1848年二月和1870年九月

等多次革命，其間交織著革命與復辟、共和與帝制、內亂與外戰，國內局勢動蕩不寧，鬥爭道路坎坷不平。這說明，為了戰勝舊勢力的統治，往往需進行多次的革命或改革，不僅英、法如此，就連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亦莫能外。對美國幸運的是，它是一個從來沒有過封建制度而且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國家，加以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諸因素，使之在政治自由、經濟發達、文化水平均舉世無匹。然而切勿忘記，美國也經歷兩次革命，即1775至1783年的獨立戰爭與1861至1865年的南北內戰，通過流血犧牲方換得今日之果實。

從英、法革命的歷程看，封建制度之強大和革命的艱鉅、激烈程度往往成為正比。但封建勢力及其殘餘之掃除，卻非一次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所能解決。法國革命曾出現過1793年的雅各賓專政，採取十分堅決激烈的措施，但並未能防止後來的熱月政變。因為革命的狂飆怒潮固然迅猛地襲擊了腐朽的封建大廈，蕩滌著舊勢力的污泥濁水，但單憑一兩次革命高潮並不能完全解決清除坍塌建築物的殘磚碎瓦之問題，鏟除封建主義盤根錯節的地基往往要遷延時日，付出艱鉅的代價。革命的首要任務是粉碎封建勢力的猛烈抵抗，革命的完成卻需要在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諸方面一點點地廓清舊制度的基地。因此，一個國家經過革命後，是否順利地清除封建傳統勢力，不能僅僅根據政治革命的激烈程度來判斷，也不要被革命在形式上的似乎徹底或不徹底所迷惑。不錯，英國在1688年政變之後仍然保留了世襲君主制及議員世襲的貴族院等，但繼政治革命很快就發生了產業革命這一場比較平靜而威力並不因此減弱的變革，結果導致封建制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之消滅。所以英國社會雖保留許多封建儀表，但實際上卻在比法國民主和自由的基礎上較順利地建立起來。法國革命曾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和《人權宣言》而著稱於世，但革命後幾經反覆，小農經濟亦長期保留，故後來先後出現拿破侖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的法蘭西帝國、波旁王朝 (Bourbon) 復辟，以及路易·波拿巴 (Charles-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1808-1873) 的

法蘭西第二帝國。如果說，英國是完全資產階級化的國家，君主不過徒有其表而已；那末法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仍被人稱為“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或“沒有皇帝的帝國”，其源蓋有所自。

2. 德、意、日：今日看來，為了充分理解封建制被取代這一社會更迭之歷史過程，僅僅局限於分析近代的英、美、法是遠遠不夠了，必須將目光放大，通觀近現代的全部歷史，研究更多的國家。因為英、美、法諸國固然幾經反覆，卻遠非最曲折最複雜的典型。放在一部世界通史的背景中觀察，它們畢竟還是比較單純、順利之例子。同英、美、法相比，其他封建勢力更加頑固的國家，例如德、意、日、俄以至中國等亞洲國家，由於生產水平發展不足，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的進程顯得格外漫長、複雜而曲折，人民付出的代價益加高昂，消滅封建殘餘的任務也特別艱鉅。十九世紀中葉，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已普遍擺在歐洲各國的日程上，1848-1849年的全歐性革命席捲了法、德、意、奧等等國家。不過這次革命並未成功，其後一些國家的統治者被迫自上而下地實施改良、改革或維新，使封建國家逐漸資本主義化。比較著名的有1861年的俄國農奴制改革，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國、意大利的統一運動，以及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

本來英、法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通過一次革命，尚不足根除封建勢力，而採用自上而下的改良來實現社會之更替，更是一個遷延時日、充滿苦難的歷程。近代的德、意、日、俄諸國正是如此，它們儘管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無論政治、經濟或思想、文化方面都帶著明顯的封建胎記。在政治上，這幾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一直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二元君主國，其中地主仍居於主導地位，整個國家實際上是座軍事專制的“大兵營”，幾無民主自由可言。在經濟上，它們的資本主義是在保持大量封建殘餘的前提下，依靠國家官僚機構的力量緩慢發展起來的：即用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的中央集權，來補充私人資本發展的不足，是帶有軍事封建特點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人民的薪金少、工作日強、生活水平低下，但軍事

工業卻得到優先、片面的發展，沙文主義 (Chauvinism)、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被大肆鼓吹。結果進入二十世紀後，德、意、日三國竟發展為法西斯主義，對內專橫暴虐，對外窮兵黷武，成了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凶，給人類文明帶來空前的浩劫。必須指出，封建殘餘的大量存在，為孳生法西斯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使得德、意、日諸國比英、美、法花了更長的歲月，付出了更昂貴的代價才逐漸解決資本主義之徹底戰勝封建勢力的問題。為此，它們的人民也吃盡了苦頭，日本嚐到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滋味，德國至今仍蒙受民族分裂的惡果。然而正是民族的厄運和血的慘痛代價，使德、意、日能夠以1945年戰敗投降為契機，將國家的發展納入比較正常的近代工業化道路之上。

3. 俄國——蘇聯：沙皇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之發展，與德、意、日本屬異曲同工，然到二十世紀初卻步上略為不同之道路。由於1917年革命的發生，使俄國不像德、意、日那樣繼續發展資本主義，而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之理論宣佈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唯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不免帶有空想的成份，但至少必須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方可實行，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條件卻遠遠不如英、美、法甚至德、意等國，故俄國革命後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並愈來愈演化為社會封建主義。這種社會封建主義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封建主義。眾所周知，俄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就其頑固性而言，在歐洲是無與倫比的。長期以來，專制的沙皇俄國一直是歐洲一切封建勢力的支柱，因此該國革命的爆發比英國足足晚了兩個半世紀。後來革命雖然發生，要完全克服封建殘餘、建設資本主義，當然十分艱難。正如嬰兒的成長深受孕育它的母體的影響一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也無法擺脫它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和歷史傳統。在沙俄時代，經濟發展遲滯落後，小生產者的自然經濟猶如汪洋大海，東方式的專制傳統深遠牢固，廣大民眾貧困而又愚昧。清理這筆遺產決非輕而易

舉，也不會是逕情直遂的。可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列寧明知“我們苦於俄國資本主義的不夠發達”，卻仍然宣稱不僅要消滅封建殘餘，也要同時消滅資本主義，結果反而使俄國長期陷入難以解脫的矛盾深淵之中。

不過經歷一段實踐，列寧也逐漸看出克服封建勢力之艱難比發動一場革命尤甚。他曾經指出，“可以趕走沙皇—趕走地主—趕走資本家。我們已經做到這一點。但是，在一個農民國家中，卻不能‘趕走’，不能‘徹底消滅’官僚主義，只能慢慢地經過頑強的努力使它減少”，“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如果說有甚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唯其如此，列寧乃提到必須反對“現代的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後來他的這種憂慮果然被證實，在斯大林 (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 時代，蘇聯發生了一些人所共知的悲劇：對領袖個人迷信的流行，民主生活與國家法制的健全，肅反擴大化造成對黨內不同政見者和無辜公民的鎮壓，等等。斯大林死後，情況稍有改善，然今日在蘇聯掌權的仍是打著共產黨員招牌的新官僚階級，他們利用一黨專制所佔據的大權，把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成其發財致富的無窮源泉，肆意侵吞、揮霍民眾含辛茹苦創造出來並交給國家的勞動成果，權力和財富享用、支配成了同義語，其支配之多寡則與權力大小成為正比。如果綜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之德、日等國與今日之蘇聯，其社會發展至少有以下之共同特點：利用中央集權、官僚經營、國家壟斷，強制推行工業化；畸形、優先地發展軍事工業，推行沙文主義政策；經濟片面發展，而人民生活水平並未得到相應之提高；生產有所進步，但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並未添加多少，元首獨裁和政黨專制大行其道。爾今，德、日之狀況已大有改觀，而作為超級大國之一的蘇俄卻正步昔日德國等之後塵。其封建殘餘的徹底消滅尚有待於他日，其因與其原來封建專制之強於西方應不無關係。

4. 中國：如果說歐洲東部的俄國，歷史上其封建專制在全歐首屈

一指；那麼世界東部的中國，其專制主義更居於全球之冠。中國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之傳統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小農經濟基礎亦是根深蒂固，廣大民眾長期陷於貧困、愚昧的水深火熱之中。儘管中國曾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規模至大的農民戰爭，然中國的專制主義統治依然故我，甚至越來越強大。這再次證明專制勢力的強大和革命的艱鉅、激烈程度往往成正比，一國的專制主義勢力是否被克服，不能僅僅根據革命的激烈程度來判斷。1911年辛亥革命後，一人專制的“家天下”結束了，但一黨專制的“黨天下”卻取而代之，專制主義勢力仍然頑固地存在著，故1919年的“五四”運動乃以“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為口號。後來1976年的“四五”運動所要求的，亦仍然是民主自由和國家之現代化。倘若我們撇開“家天下”與“黨天下”的區別不論，則辛亥革命後中國之中央集權、專制統治比之歷代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數十年來，吾人曾看到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之再現，諸如地方割據、軍閥混戰、內憂外患、民變四起、杯酒釋兵權、焚書坑儒、文字獄、殘殺功臣、女人干政、權臣作亂、朋黨之爭、宮廷政變等等，不啻一部“廿五史”之重演。更有進者，古代一人被判“有罪”，至少可博得親友同情，死後親友可公然哀哭、收屍，敵方人員也常以“各為其主”而得寬宥；而現代，一個人被視為“牛鬼蛇神”，則其父母、妻兒均須與之劃清界限，妻子揭發丈夫、子女檢舉父母之事多如牛毛，此實已集歷代中央極權之大成矣。當然，由於時代的發展，也添加了一些新的名堂，如政黨專政、元首獨裁之類。比起蘇俄，中國更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夠發達，而要在有著汪洋大海般的小生產的社會中建設所謂“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社會主義不是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就是社會封建主義或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從十年文革期間來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竟被變成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從而導致了天安門革命運動的悲壯演出。今天，中國雖出現改革維新之趨勢，但專制主義勢力實非一朝一夕所可克服。中國的民主自由傳統較之蘇俄尚有相當之差距，中國民眾之生活

水準、文化程度尤低於蘇俄，故以歷史發展的規律來衡量，蘇俄之克服封建主義固遲於西歐、美國，而中國則將更慢。職是之故，“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或許還是頗有道理的。

(一)獨裁：在歷史上，獨裁、專制一向是被用來與民主、自由相對而稱的。古代世界各國雖也出現過一些民主或共和的政治，譬如希臘的雅典民主制、羅馬的共和制等。但獨裁統治更比比皆是，如希臘許多城邦的僭主政治 (Tyranny) 或寡頭政治 (Oligarchy)，以及羅馬愷撒 (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 的獨裁統治 (Dictatorship) 和奧古斯都 (Augustus，即屋大維 Gaius Octavius，前63—公元14) 的元首政治 (Principatus)。至於長期存在的“家天下”，國家本屬一人或一家所有，君主專制、獨裁自是必然，“朕”、“孤家”、“寡人”均為帝王之專用語。關於中國古代之君主獨裁或極權，將在正文討論。此處擬就近代以來在帝制逐漸消失的條件下，所出現的一些獨裁統治之模式，略加鉅析。

本來通過近代各國之資產階級革命，君主制逐漸被共和制所取代，“家天下”也變成“黨天下”。有些國家如英國，雖然保留君主和王室，但其政治已屬議會民主制，絕非從前之獨裁專制統治。可是，也有相當多的國家，在一定時期內仍然出現沒有帝王的元首獨裁或政黨專制，其嚴重程度並與各該國原有封建統治的強大成為正比。一般來說，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世界上只有美、英兩國較早並長期實行真正的議會民主制，兩三百年來美、英沒有出現獨裁專制的統治，也無產生軍事政變的紀錄。不過其餘國家由西而東則次第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專制獨裁，其中比較昭彰者如下：(1) 法國的波拿巴主義：1789年爆發的革命雖一度推翻了波旁王朝，卻未能結束法國的專制統治，於是在十九世紀曾出現了拿破侖的法蘭西帝國及拿破侖三世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其特徵係以軍閥為元首，對內藉軍隊、警察、官僚實行高壓統治，對外推行沙文主義、大肆發動侵略。史稱“波拿巴主義” (Bonapartism)。(2) 德、意、日的法西斯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二十至

四十年代，德、意、日以專制獨裁、窮兵黷武的法西斯主義 (Fascism) 而危害世界、臭名遠揚。在德國，希特勒 (Adolf Hitler, 1889-1945) 及其納粹黨 (Nazi-Partei, 即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駕馭全國，黨衛軍 (Schutzstaffel)、秘密警察 (Gestapo, 音譯蓋世太保) 實行血腥恐怖的特務統治。在意大利，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的法西斯黨 (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 厲行恐怖和獨裁。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下的軍閥專政，由東條英機 (1884-1948) 以陸軍大將的身分，同時擔任首相、陸相、內相、文部相、外相和軍需相等職務。其實德、意等的國社黨、法西斯黨，亦屬“黨天下”之格局，不過並非英、美等的兩黨制，而接近東方的一黨制。(3) **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自1917年革命以後，蘇聯即宣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然國家名義上由無產階級領導，實際上操縱在共產黨 (號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尤其該黨領袖的手裏。蘇聯的以黨治國，乃開世界史上一黨專制的“黨天下”之先例，後並被許多東方國家仿效。它表面上宣佈實行“蘇維埃 (Soviet) 民主”，唯蘇維埃不過是橡皮圖章會議，真正存在的是元首獨裁式的“個人迷信”，共產黨官僚可以肆意蹂躪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克格勃” (K. G. B., 即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秘密警察四處監視、殘害不同政見者及無辜百姓。如果說，德、意、日經過二次大戰的慘敗，逐漸步入民主化之道路，那麼蘇聯的共產黨專制獨裁迄今仍是該國政治的基本形式，其改變恐有待於將來。(4) **中國的“以黨治國”和一黨專制的“黨天下”**：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初曾經歷軍閥割據混戰之局，至1928年北伐戰爭成功方由國民黨一統天下。國民黨奉行“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之方針，在北伐末期即藉“清黨”而捕殺共產黨，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抗戰勝利後，雖宣佈結束該黨之訓政而行憲政，但對共產黨仍不見容，對其他黨派也未能聯合、團結，擺出一副“一黨專制”之架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取代國民黨而將天下攬為己有，它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稱為“人民民主專政”。然共產黨並未跳出一黨專

制的“黨天下”之窠臼，反而愈演愈烈。名義上它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實際上卻使它們淪為自己的傀儡和附庸。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據稱係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唯一個國家是否有民主、自由，不能僅憑官方口頭上之宣傳。僅以195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和1976年的鎮壓“天安門革命運動”為例，共產黨之大權獨攬、壓制民眾實已達登峰造極的田地。而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元首獨裁和專制更是駭人聽聞、史無前例。那種“萬壽無疆”的歡呼聲和“早請示”、“晚匯報”制度，同“Heil, Hitler!”的口號聲及德國之元首崇拜儀式並無二致；《毛澤東思想萬歲》之著作，同《我的奮鬥》如出一轍；“紅衛兵”豈非就是“黨衛軍”？！殺人如麻的“聯動”（即由高幹子弟組成的“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直就是“蓋世太保”！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中國大地演出的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專制樣板戲，使全世界民眾看得目瞪口呆！目前中國正在進行改革，我們當然希望它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由歷史上極端頑固的專制統治脫胎而出之“一黨專制”是不會輕易結束的。中國人民要贏得真正的自由、民主、進步、繁榮，恐怕還要付出學費、吃些苦頭。余衷心為吾土吾民而祝福，深願真正的“英特納雄耐爾”的理想早日實現！

（一三）擴張：獨裁與擴張往往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蓋歷史上之專制主義大國通常總是對內獨裁與對外擴張相結合。試觀古往今來那些聲名赫赫、曇花一現的大帝國，莫不如此，諸如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 前550—前330）、亞歷山大帝國（Alexander's Empire, 前336-前323）、羅馬帝國（Roman Empire, 前27-公元476）、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 公元395-1453）、阿拉伯帝國（Arab Empire, 622-1258）、查理曼帝國（Charlemagne's Empire, 800-843）、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962-1806）、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 1206-1480?）、奧托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0-1922）、帖木兒帝國（Timur's Empire, 1370-1405）、莫臥兒帝國（Mogul Empire, 1526-1857）、沙皇俄國（Czarist Russia, 1547-1917）、拿破侖帝國（Napoleon's

Empire, 1804-1815)、奧匈帝國 (Austria-Hungary, 1867-1918)、德意志帝國 (Second Reich, 1871-1919) 和第三帝國 (Third Reich, 1933-1945)，以及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唐、元、明、清等帝國，等等。

誠然，由於文明產生淵源、所處地理環境和民族歷史傳統諸因素之不同，許多帝國的形成及對外擴張往往呈現各別之特點。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奧托曼帝國等均地跨歐、亞乃至非洲；歐西國家由希臘、羅馬時代起，即注重向海外之擴張，尤其是地理大發現後更是如此；亞洲東部國家，如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帝國，主要立足於本土，逐步向四裔拓展，奉行大陸政策。不過歷史上各國之擴張，似有一共同規律：野蠻民族起初常常戰勝文明民族，但最終必被後者所同化。觀諸世界歷史，游牧民族之打敗農業民族、落後野蠻民族之打敗先進文明民族，實不乏其例。如歐洲史上哥達人 (Goths)、汪達爾人 (Vandals) 等日耳曼人 (Germans)，即所謂“蠻族” (Barbarian) 之亡西羅馬帝國，奧托曼土耳其人之亡東羅馬帝國，及後來希特勒第三帝國之亡法國，中國史上蒙元之亡宋、滿清之滅明，等等。然落後民族若欲長期維持其統治，則終將被文明民族所同化，放棄其游牧習性、落後生活方式以及好戰黷武之精神。為甚麼落後民族初多居於主動而能得逞於一時，先進民族初陷於被動但最終仍能反敗為勝？此處且舉強盜和富翁之例，或可收一目瞭然之效。通常富翁為既得利益者，他一面繼續想法獲利，一面要僱保鏢來防盜，惶惶然不可終日。強盜想過富翁似的生活，又不願艱苦奮鬥，於是集中全力練武，只要打劫成功，一夜之間即身價陡增。強盜天天計劃行事，富翁自是防不勝防，故主動者容易打敗被動者。一旦強盜躋身於富翁行列，乃千方百計模仿其生活方式，少數或學得維妙維肖，大多均不免賊頭賊腦。最後有些人已無復當日的尚武精神，許多人則終於難逃法網。故從長遠來看，不是富翁戰勝強盜，就是強盜變成了新富翁。

(一四) 戰爭：人類自形成以來，即不斷經歷各種性質、類型的戰

爭，有對自然界(包括其他動物)的搏鬥，也有人與人之間的自相殘殺。雖然人類號稱“萬物之靈”，但其同類相殘的“獸性”一直是與生俱來的。說是“獸性”還算是客氣，其實有些方面比禽獸還不如，因為“虎毒不食兒”，而人類歷史上父子相殘、兄弟仇殺的例子則比比皆是。更有進者，人類比動物更勝一籌，即善於發明各式各樣的工具和武器來自相殘殺，從手握最簡單的石器，到採用最先進的原子彈及各式導彈。眾所周知，近代文明最發達的歐洲，恰好是歷史上最大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屠場。這證明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弱肉強食”、“生存競爭”仍是放之動物界而皆準之真理，自詡為“高級動物”的人類亦莫能外。前述世界歷史上的諸大帝國，無一不是通過大規模的擴張性戰爭而締成。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之建立，也經歷了你死我活的搏鬥，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至於家族仇鬥、鄉村互毆、地區混戰、民族戰爭，更加比比皆是，舉不勝舉。

此處我們暫置古代、中古時期各國的內戰或國際戰爭於不論，僅就近代由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過程中所爆發，或今後可能爆發的一些國際大戰作些觀察或預測：(1) **拿破侖戰爭**：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出現了拿破侖帝國和拿破侖戰爭。這場戰爭因法國欲以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而引起，法國既要控制落後的封建的歐陸諸國，又要與先進的資本主義英國競爭。英國因為先進，所以力主“自由貿易”；法國不如英國，難以在經濟上競爭，於是一面發動戰爭侵略別國，一面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結果資本主義的英國和封建主義的普魯士、奧地利、沙俄諸國聯手，從東、西兩面夾擊正在走向資本主義的法國。拿破侖一度稱霸於歐洲大陸，甚至東征俄國，佔領莫斯科，然最後終於遭到失敗。此後，法國才逐漸走上民主化、工業化的道路。(2)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次大戰的主角是德國，它企圖通過戰爭來加速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結果先進的英、法兩國和落後的俄國聯手，從東、西兩面夾擊新興的德國(以及奧匈)。戰爭的發源地是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戰爭的結局是英、法戰勝德、奧，

俄國則因革命而中途退出。(3)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次大戰實際上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繼續和發展，大戰的主角還是德國（以及意大利、日本），它不甘心於昔日的失敗，仍圖以戰爭來補充其資本發展之不足。結果資本主義的美、英、法諸國和社會主義的蘇俄聯手，從東、西兩面夾擊法西斯主義的德、意。而在亞洲，則由中國及美國等聯合對付日本。戰爭的發源地，包括歐洲的奧地利、捷克、波蘭及亞洲的中國等處，戰爭的結局是中、美、英、蘇等同盟國戰勝德、意、日軸心國。此後，德、意、日諸國才真正走上民主化、工業化的道路。

(4) **第三次世界大戰(?)**：從目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的對立，以及中近東的緊張局勢來看，人類能否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確成問題。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發展，俄國雖已步入近代工業化之路，但依然相當落後，猶如從前的法、德一樣，它亦希望用對外擴張的方法來獲得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勢力範圍，以補充自身資本發展的不足。唯美、英、法、德自不能坐視俄國之勃起與競爭，倘若將來中近東的石油能源危機威脅到各大國之生存，則一場美、英、法、德同蘇俄之間的大戰實有可能爆發，戰爭的發源地或許就在波斯灣一帶，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世界將會分裂而各自投入一方。此外，中國的動向堪值重視，中、蘇雖同屬社會主義國家，然歷史已經證明，不僅資本主義國家間會誓不兩立，社會主義國家亦是如此（如中蘇、中越等等之間的衝突與戰爭），“國際主義”是口號，“民族主義”才是本質。從長遠看，美國明知中國是可怕的勁敵，但目前尚未構成威脅，為了對付直接的敵人蘇聯，美、英諸國大概會拉攏中國作為暫時的同盟者，哪怕是含有砒霜的糖也得吞下去。倘若歷史發生相似的“重複”，則這樣一幕景象是可能的：資本主義的美、英、法、德諸國和社會主義的中國聯手，從東、西兩面夾擊社會主義的蘇聯。結局自然是蘇聯失敗，並從此老老實實走向真正的民主化、工業化的道路。至於日本、意大利等小強國，它們在歷史上往往根據形勢及國家利益而左右搖擺，故其歸屬一時自難斷定。(5) **末次世界大戰(?)**：假如上面對第三次世界

大戰的推測成立，則人類恐難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戰，雖然也許是最後的一次。不言而喻，是次大戰極可能是以美、蘇、英、法、德為一方，以中國為另一方。中國目前固然落後，卻不等於永不發展。曾經全盤唐化的亞洲之日本，今日在經濟上能居於世界先進之行列，則中國之未來實未可限量，也許需要耗費一兩個世紀，但在歷史之長河中亦不過短暫的一瞬。如果中、美真的聯合打敗蘇聯，則昔日盟友將立即反目成仇，中國一時難以同西方國家展開自由競爭，必然要藉本身之軍事力量（目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極低，唯原子彈、導彈之發展卻居世界第三位）來補充資本發展之不足。中國的領導人曾一再保證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然而如果形勢有變，為了發展本身的民族工業以同外國競爭，為了控制勢力範圍以輸出商品、資本，為了解決難以負擔的膨脹的人口壓力，將來中國是否會束手自斃而不對外擴張，就斷難預料了。屆時，拿破侖所預言的東亞睡獅果真醒來，世界將會為之一動，全球也許會真正驚呼“黃禍”（The Yellow Peril）了！不過，倘若中國真的與世界各國為敵，或欺壓別的小國，最初或會得逞於一時，最終自亦難免一敗。然後這個世界最後的專制主義堡壘，才會真正步上民主化、科學化的道路。彼時人類或已距“大同世界”不遠矣！

（一五）民族：此處所謂的“民族”乃賦以廣義之概念，包括種族、民族、部族等等在內。世界上有難以計數之民族，然若以其所居之地理條件論，似可歸納為平原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山地民族諸種，而且地理環境對各種民族之性格肯定有不小之影響。一般來說，平原民族多居於河川附近，自古以來以經營農業為生，兩河、尼羅河、印度河、黃河流域的東方四大古老文明即屬此類，其民族性呈現勤勞、忍耐、保守等特點。海洋民族如古代的希臘、羅馬以及後來西歐的一些國家之居民，其特點是開放、進取、冒險。游牧民族在歐亞諸洲均不乏其例，中國北方在歷史上常受它們所擾攘，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其民族性的特點是驕悍、粗獷、豪爽。至於山地民族，如中國的藏族、尼泊爾的廓爾喀人（Gurkhas），其民

族特點是**驍勇、執著、忠誠**。正如歷史發展除必然的規律之外，往往會受一些個人性格所影響一樣，不同民族在參加創造歷史的同時，也一定會打上其民族性的烙印。因此，吾人在研究歷史時，既要考慮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客觀規律）和偶然性（個人作用），也要兼顧介於此二者之間的民族、地理諸因素。

如以膚色而論，世界之種族主要可分為三大類：**黃色人種**（即蒙古人種），**白色人種**（即歐羅巴人種），**黑色人種**（即赤道人種）。每大種之中自尚有若干類型，亦不能細述。由於長期自然、地理環境等之影響，不同種族在體質型態、生活方式諸方面，呈現各自的特點。我們鄙視種族主義，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反對“優秀”人種應該統治“劣等”人種的說法。然不可否認，數千年來歷史發展之不同進程，使各種族的文明程度產生頗大之差別，總的來看白種人較高，黃種、黑種次之。這樣說並非“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而是承認落後、不甘落後，方能擺脫落後。況且每一種族不論文明程度高下，均各有其優點，彼此之間的差距也是可以縮短並且互易先後的。譬如目前日本人在經濟方面已趕上甚至某些方面正在超過歐、美，日本人既然做到，中國等其他黃種人將來亦可能做到。另如黑色人種在音樂、舞蹈、體育等方面具有極佳之才能，若以當今世界流行的歌舞看，黑人實已“風靡全球”矣！

儘管各民族在經濟發展、文化水平諸方面，存在千差萬別，然落後民族要縮短同先進民族的差距，只能依靠其自身之努力，“揠苗助長”或“越俎代庖”的做法都是不適宜的。我們常常聽到一些論點，認為古代中國漢族對四裔的擴張，同近代歐美列強對亞、非、拉丁美洲的侵略有著本質的區別，漢族的經略客觀上將先進的生產方式帶給邊疆各族，等等。這些主張歸根到底乃形是實非，頗值商榷。蓋古代中國與近代歐美之區別，端在生產方式發展程度的不同，至於向邊裔擴張或向海外擴張，其本質並無二致。如果我們譴責俄羅斯民族的四處擴張，譴責蒙古、滿洲諸族的南侵中原，自然必須同時譴責漢族在

歷史上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進侵，切不可以前的大一統國家的定局來為歷代王朝之向外侵略辯護。我們譴責歐、美列強的海外擴張，也必須同時檢討鄭和下西洋時恃強干涉外國內政的一些舉動，切不可因它們並未導致海外殖民地之建立而自我安慰。總之，評價歷史的公正原則必須對一切國家、地區、民族一視同仁。倘若我們主張“民族自決”、“民族自治”或“民族自主”，就必須切切實實賦予各民族以真正的自決權、自治權或自主權。那種表面上高喊“民族自治”、反對侵略戰爭，實際上由外國人統治土著、由大民族統治少數民族，不啻是“掩耳盜鈴”、“賊喊捉賊”的伎倆。假如一國之統治者真正想允許境內其他民族自治，那就請不要派出‘欽差大臣’，讓該民族人民自由決定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吧！至於該族願意發展工業、農業或畜牧業，願意如何使用自己擁有的資源或支配自己製造的產品，也聽由自便。

（一六）宗教：在人類的諸般文化之中，宗教實為包羅萬象、引人入勝而又深奧複雜、神秘莫測的一個範疇。余在拙著《中國宗教史》曾道及宗教產生之根源：“雖然古代人類的原始宗教，同文明時代出現的幾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即伊斯蘭教等），在思想體系、制度組織的程度方面，可能有天壤之別，然世上一切宗教創立之目標多同為祈求人類自身之安寧：應付自然，希望平安；立足社會，追求平等”，“文明時代出現之諸多宗教，一方面如同原始宗教般對自然具有感性成分，一方面往往反映了勞苦大眾追求人間‘平等天國’之理想，並在歷史上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拙以為，歷史上既有奴隸、農民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四大宗教”，而且有工人的宗教，如近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

倘若吾人對馬克思主義從產生至傳播加以觀察，即可發現它同其他宗教有許多極為類似之特點：1、作為民變旗幟：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共產社會”雖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提出的，然究其實質，同過去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所主張的“極樂世界”、“平等天國”等等並無二致。發源於亞洲的世界四大宗教，它們之產生

均與人們要求平等、反對壓迫密切相關。如道教之形成與五斗米道、太平道關係至密，而它們均係反對東漢王朝的民變之旗幟；佛教在創立之初，乃作為反對印度婆羅門種姓制度的一種思想；基督教之產生，與羅馬帝國東部民眾反對奴隸制度息息相關；回教的形成，反映了阿拉伯民眾改革社會現狀、實現政治統一之願望；至於馬克思主義則是近代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武器。從西方看來，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曾以基督新教作為鬥爭旗幟。後來信奉新教的國家經濟發展最速，其他則次之。以中國而論，歷史上一種宗教尤其外來宗教是否立足、生根及其早晚，往往視其被中國民眾利用到甚麼程度及先後。依筆者愚見，中國民眾利用各種宗教發動民變之順序大致可表達如下：(1) 巫術：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2) 道教：如東漢末張角領導的黃巾暴動(太平道)，東晉末的孫恩、盧循起事(天師道)；(3) 佛教：如北魏末僧人法慶領導的大乘教起事，後世之白蓮教則混合有佛教、明教、彌勒教等；(4) 明教：如五代後梁的母乙起事，北宋末的方臘起事。明教本由摩尼教發展而來，後混有道教、佛教之成份；(5) 回教：明末、清初已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之起事，如馬守應(“老回回”)、馬明心、蘇四十三，有清一代之回民起義更是絡繹不絕；(6) 基督教：如清代後期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7) 馬克思主義：如1927-1949年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之暴動、起事。

2、離本土而外傳：梁啟超有云，“基督教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東亞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東亞諸國。豈不異哉？豈不悲哉？”馬克思主義創立於歐洲，今日它在歐、美罕受重視，而中國、蘇聯及許多東方國家卻將馬克思、恩格斯視若神明。正如猶太教發展為基督教，《聖經》遂有“舊約”“新約”之分，佛教傳到中國，大乘也代替小乘而居於主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東方，也產生許多變種，出現列寧斯大林式、或鐵托式、或毛澤東式、或金日成式之修正，至其修正程度則以各該國之東方傳統濃淡而定。

3、東方奉為國教：舉凡宗教，大多在某些

國家的某一時期被奉為國教。佛教曾是印度、後來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國教；中國在西漢初一度崇奉黃老道之思想，後來雖獨尊儒術，唯儒學乃被目為“儒教”；伊斯蘭教一直是阿拉伯各國（以及一些南亞、東南亞國家）之國教；基督教在中世紀曾統治過歐洲各國；至於馬克思主義，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已逐漸成為蘇聯、東歐各國、中國及蒙古、朝鮮、越南等之統治思想，實乃處於國教之地位。關於此事，其實恩格斯早有預言，他在臨終前已預見到社會主義這種工人的信仰，遲早會遭到和基督教這種奴隸宗教相同的命運，成為某些國家官方奉行的經典和教條。在〈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他反覆稱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境內的“變革黨”，並指出：“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裡，有些值得注意的與現代工人運動相同之點。……基督教在它產生二百年以後成了羅馬世界帝國的公認的國教，而社會主義則在六十年來中爭得了一個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勝利的地位”。只不過恩格斯看不到（大概也不會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在其故鄉歐西諸國之式微，倒是東方國家將馬、恩學說奉為經典及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

4、實行政教合一：西歐在中世紀曾長期存在政教合一的現象，天主教會控制了各國社會、政治、文化，到宗教改革後才逐漸出現政教分離。今日許多東方國家實行共產黨“一元化”領導，實即政教合一的表現，黨政分開則是向政教分離邁出的一步。不過只要共產黨仍是法定的唯一領導者，就無法實現真正的分離。如有一天，加入共產黨只能像教士一樣，宣傳本黨的真理，而不是做官，則社會將大大向前邁進。

5、崇拜儀式完備：在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主義之崇拜已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儀式，諸如：馬、恩、列、斯及毛澤東等的著作被稱為“經典”、“教條”，他們個人則被抬到神的嚇人高度；馬恩列斯全集在蘇聯、中國大陸之翻印，同“大藏經”等之編輯出版無異；共產黨內各級支部均設有宣教委員，以向民眾傳播如同天主“啟示”、真主“聖訓”一般的“最高指示”（原多用黑體字排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揮動“紅寶書”，以

及“早請示”、“晚匯報”等，與唸經、祈禱雷同；民眾在毛澤東、林彪出現時之高呼“萬壽無疆”、“永遠健康”，乃視之如同帝皇、教主、活佛；俄、中等國共產黨領袖身後均被當作“木乃伊”保存起來，倫敦海格特之馬克思墓地及莫斯科紅場列寧墓，實與耶路撒冷等聖地無異。

6、教派林立紛爭：各大宗教在歷史上都分裂成多種教派，如佛教初有上座部、大眾部之別，後來又分大乘、小乘，乃至密宗、顯教等，中國境內在隋唐時且形成十數種宗派；基督教有所謂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之區分；伊斯蘭教則分遜尼派、什葉派等；道教有正一道、全真道之區別，等等。因此，奉行同一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共產國家間的爾爭我鬥、勢如水火，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初有第一國際內部分裂，後有第二、第三國際之對立鬥爭，今日又分甚麼蘇聯派、南斯拉夫派、中共派等等，連阿爾巴尼亞叢爾小邦都要自行其是、大鬧分裂。其所以如此，蓋因各國共產黨對教主經典之解釋不同，而且每黨都以正統自居要他黨俯首稱臣，否則便視為異端而橫加討伐，於是共產世界遂出現教派林立之局勢。總之，在當今之世，諸種宗教已在各大洲的一些地區，各自佔有其優勢：(1) 佛教：南亞、東南亞、東亞；(2) 回教：西亞、北非、中亞；(3) 景教：西歐、中歐、美國；(4) 馬教：蘇聯、東歐、東亞。放眼全球，實不知未來之世界，竟是誰家之天下。

在論及馬克思主義乃新宗教時，有個問題理應加以辨析：宗教一般均信仰超自然的神靈，唯馬克思主義卻主張“無神論”，二者似未可等同。誠然，對神的信仰與崇拜應是各種宗教共同之特徵，但許多宗教的教主或創始人在生前往往只是一種社會理想或政治主義的鼓吹者，多半處於非法或受壓的地位，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實現自己的救世主張，而較少考慮自己身後如何受到人們的崇拜，那些系統化的神學經典、定型化的崇拜儀式、固定化的宗教組織往往是後來才最終形成的。一旦這種社會理想或主義被民眾信仰為救世真理，甚至被用來治國平天下，則其創始者便會被抬到“神”一般的嚇人高度。因此，不

僅是宗教，任何一種學說或主義，即使自我標榜為“無神論”者，在一定條件下都會走向“造神”的道路。以佛教而論，釋迦牟尼創立其說初乃為反對婆羅門教之“神”，後來小乘佛教認為佛陀乃教主而非神，而大乘佛教則將其視為法力無邊之神。至於馬克思，他和恩格斯一生孜孜於反對自己所置身的社會，但當其德、法等國的一些信徒大搞個人崇拜時，馬克思曾稱“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過後來馬、恩作為社會主義創始人而在東方各國備極尊榮，則非他們始料之所及。如果說第二國際的伯恩施坦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8) 們，比較傾向於認為馬、恩是學說奠基人而非神，那麼蘇聯的列寧、斯大林以至中國的毛澤東們則越來越將馬、恩奉若神明。這也許正是第二國際領導人被視為“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的原因之一吧！此後，舉凡不同意馬、恩、列、斯、毛等人是“神”者，甚至一切“逆我者”都被斥之為“修正主義” (亦即“異端”)。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一個重要“造神”階段。中國本來具有容納多神教的土壤，歷史上不僅將儒、道、佛冶於一爐，後來更將基督教、伊斯蘭教兼收並蓄。中國民眾信奉的神、佛本來就多得不計其數，何妨再加多天安門廣場上的幾尊。倘若吾人果真在某些窮鄉僻壤供奉關帝、佛陀的小廟裏，看到有馬、恩、列、斯、毛的像，那實在不足為怪，可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目前，中國正在走一二百年前英、法、德等國開始走的工業化道路，它必然會出現西方國家曾經出現過的資本原始積累、機器導致失業、民眾生活貧困、通貨日益膨脹諸多問題，也許程度稍好一點，也許更加嚴重一些。想當年，西方工人曾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來反對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害，今後中國工人會不會以官方欽定為老祖宗的經典理論來進行遊行、示威、罷工呢？正像許多武器都具有雙刃，既可傷人亦可自傷，馬克思學說在西方國家早已衰落，它在未來東方國家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不過無論如何，任何社會只要還有生命力，就一

定會找到消除自身病害的妙應靈方。佛教、道教曾是民眾爭取平等的旗幟，但中國歷朝皇帝均可利用其勸人忍耐、追求來世的一面，使民眾安份守己、安居樂業，以利於統治。在今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許多理論可能會被宣佈為“過時”或不切中國“實際”，但馬、恩、列、斯、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被作為有益無害的神明供奉起來，一直到“英特納雄耐爾”實現！

(一七)思想：世界各國在某一時期或自始至終，總有一種宗教、學說或主義被奉為社會的統治思想。有時社會允許人們有較多的思想言論自由，然這本身亦正基於一種主張自由的學說。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神學曾統治一切，許多科學理論被視為異端，有些科學家本人則被投於宗教裁判所。近代以來，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技革命，“人性論”、“人道主義”廣泛流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及“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以個人奮鬥為動力的精神迄今猶方興未艾。

歐洲文藝復興起源於意大利，其主要思潮“人道主義”又稱“人文主義”。它以人為中心來觀察世界和一切問題，主張關懷人、尊重人，提倡個性解放和個人奮鬥。根據這種思想，每個人都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以豐富的知識與健全的體魄去發財致富或爭取其他事業的成功。如果說，意大利早期文藝復興還只是孕育在封建母腹內的嬰兒躁動，那麼到了後期，遍及西歐各國的文藝復興已成了呱呱墜地的娃娃的第一聲喊叫。以人文主義為標誌的文藝復興，同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尼德蘭革命等等，這些五色繽紛、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場面，都是為新時代來臨而敲響的陣陣緊鑼密鼓。今日，歐洲的科學技術等高度文明均拜文藝復興之賜。而中國呢，其東方式的文藝復興不是尚未到來，就是僅僅在開始。

在中國，社會統治思想也經歷了幾番轉變。姑不論商、周時代的敬天事鬼、君權神授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諸侯爭霸、列

國混戰，許多大國都想兼併別國、一統天下，所以競相禮賢下士，招聘人材。而一些有識之士也紛紛到各國活動，發表自己對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的意見。一時間諸子蜂起，議論紛紛，各家各派自由辯論，學術思想至為活躍。當時最著名的有儒、道、墨、法、名、陰陽、縱橫、雜、農及小說家等所謂“九流十家”，史稱為“百家爭鳴”。這是中國偉大思想家輩出的時代，也是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後來秦始皇以法家思想而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大帝國，法家一度成為社會之統治思想。暴秦之速亡，說明單靠嚴刑酷法不足以長期統治中國之百姓，故西漢初年改行道家黃老學派之“清靜無為”。但七國之亂後，漢室深感“無為而治”容易造成放任自流，削弱中央集權，不利於統治中國百姓，於是漢武帝乃採董仲舒（前179—前104）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被證明最適於統治中國百姓，從此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垂兩千餘載。

儒家思想之所以適合中國，應與中國之民情有關。蓋董仲舒之儒學已經改造，兼取法家等說之部分思想，它表面上高談“仁義道德”，實際上則以嚴刑峻法為後盾。而中國民眾既不服軟、亦不服硬，最宜以“中庸之道”御之。在十年文革中曾對此提供明證，長期的“無政府狀態”使全國百姓中間派系林立，當局的高壓卻又導致百萬人民投入“天安門運動”。不過儒家思想比較適合於“家天下”之統治，辛亥革命後，中國進入“黨天下”的格局，隨著兩千餘年專制帝制的終結，孔孟之道的影響亦日趨式微。雖然1919年“五四運動”之“打倒孔家店”，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之“批林批孔”，並未能消滅儒家思想，唯辛亥革命後中國之統治思想卻由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先後取而代之，這兩種思想均發源於西方，說明時代業已大變。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在《歷史研究》之巨著中，曾懷疑共產主義這種西方理論之輸華是否會給中國政治帶來根本的變革，他舉中國固有哲學擊敗一度廣為流行的西來佛教為例，表示中國古老的哲學也許能夠重新發揮潛力、再度取得勝利。拙以為，辛亥革命之埋葬帝

制，標誌著儒家作為社會統治思想之地位的永遠結束。中國孤立狀態的被打破，使西方思潮必然衝擊著這個最後的專制堡壘。先後統治中國的三民主義、社會主義雖然以西方思想中國化的形式出現，而且最終必然要與中國固有的哲學思想（包括一部分儒學）相融合，但今後儒家思想充其量只是中國歷史上哲學遺產的一部分，只能算是“百家”之一，它昔日壟斷政壇的光榮歲月再也一去不復返了！這裏尚需指出，儒學在過去兩千多年中，儘管被歷代帝王奉為統治思想，然彼時似並未以“思想”而定罪，未聞因反對儒家就被打成甚麼“反動派”，在儒學穩居統治地位時，帝王們曾屢召儒、佛、道諸派代表人物公開辯論，以證明本派學說之是、批評別派學說之非。今天儒學雖不再佔統治地位，唯“以理服人”的傳統宜加發揚。如果在民主、自由風氣已彌漫全球之際，吾土吾民尚生存在不信奉某種思想就是“反革命”的高壓之下，則中華文化之復興何日可望？！

（一八）**科學**：提及這一命題，我們通常會想到歐美各國近代科技之先進，同時也會記起中國古代指南針、造紙法、印刷術、火藥等“四大發明”。跟著一個問題不禁會油然而生：為甚麼古代科技曾居於先進行列之中國，在近代以來卻大大落後於西方？其實這是一個涉及整部中國歷史的全局性大問題，它與中國為何會長期存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密切相聯，誠非三言兩語即可說明。不過下列兩點至少與此有關：（1）中國社會階層兩極分化極為嚴重，一方面上層具有高度的文化和物質享受，另方面下層卻非常貧窮愚昧。以主體民族漢族而言，即缺乏比較平均、統一的全民族文化，民族內部的文明水準相差懸殊。因此，古代中國雖有驚人的世界先進發明，然小農經濟卻千百年來依然故我；今日中國雖發射了導彈、衛星，但廣大民眾之生活水平卻十分落後。這種落後的根深蒂固的基礎，一時是難以迅速改變的。（2）中國歷代王朝多實行“重本抑末”、“強本弱末”亦即“重農抑商”的政策，把商業、奢侈品生產乃至科學技術，一律視之為“奇技淫巧”而加以“抑”甚至“禁”。這對農業的發展固起了很大作用，有利於民生

安定、王朝統治穩固，但卻有害於工商業之發展。由於缺乏通商貿易之動力，科學技術自然也難有突破性的進展。這可以說明，為甚麼明初鄭和下西洋雖使海外交通取得很大成就，但卻未能導致中國式的“地理大發現”。這也可以說明，中國千百年來保持一種“男耕女織”的田園式風光，其間固締造了古老的中華文明，卻也造成了近代以來科學之落後。

中國近代科學之落後，恐怕也與長期實行君主專制及中央集權頗有關係。中世紀的歐洲固然也被神權、王權所禁錮，但自文藝復興以降，“民主”、“自由”之風遍吹，衝決了昔日之樊籠，科學技術之發展遂一瀉千里、不可遏止。唯中國時至今日，儘管接受了西方的某些政治理論，但只有與中國的傳統相吻合者方得大行其道，至於西方科學、民主之真諦尚未流行於神州大地。僅舉一例即可明之，在西方，政治也是一門學問，它與其他科學一般均可自由討論，而在東方卻禁忌頗多，必須在某種欽定的思想指導下方可言自由的學術討論。目前，一些士子雖倡言“科學無禁區”，然某些範疇因不屬於“科學”，自然談不上開禁。但願吾人能早日迎來中華文化復興之日，屆時中國廣大的落後的農村將呈現日新月異之面貌，農業經過技術改造而實現機械化乃至生產工業化，數億農民具有高度的文明水準。唯有如此，才算是真正實現了經濟之現代化。反過來說，也只有中國農業走上科學的道路，才會消滅官僚主義、國家壟斷等賴以生存的物質經濟基礎。

（一九）分工：分工與協作是對立、統一的兩件事，有分工必有合作。人類從誕生以來，在組成為社會的過程中自少不了諸方之協作，同時也出現了各種分工。人類的分工是多方面的，各種年齡、性別、職務、行業、部門、地區、民族、國家之間，均存在或可能出現分工。而自古至今，分工越來越發展，逐漸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例如原始人最初從事採集、狩獵，後來出現了農牧經濟，接著先後出現了農業與畜牧業的分離、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以及後來商業的出現和工業的形成。當然在這漫長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體力勞動

與腦力勞動之分工。以腦力勞動而言，分工也越來越細，在古代一個哲學家可以同時又是詩人、劇作家、數學家，後來隨著各種學科研究水平之提高，一個科學家主要只能專修一門或其中之一小分科，其餘只能作為業餘之興趣與愛好。今日人類之分工已經精細到這種程度：一艘航天飛船的發射，需要無數各有專長的科技人員之衷誠合作，萬千參加者缺一不可。這是目前最高級的分工，也是最高度的協作。它預示“勞心者治人”正在真正實現，唯居於社會領導地位的科學家並不是從前那種統治者，他們的任務在於充分運用腦力思考，研究如何使社會實現人人平等。

分工既是社會之必需，社會的每一成員自當本著“揚長避短”的原則，尋找最適於發揮自身特長、才能的職業，即所謂“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因此不同職業之分工本無高下之別，蓋每人都是以“上帝”（如果真是上帝造人的話）創造的某一器官去服務社會與人群，只不過有人用腦或用口、有人用手或用足而已……。但在階級社會，統治者愛憑自己的主觀看法來定不同職業之等級，造成社會上人們互相歧視的不良之風。例如，元代流行所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在金錢社會中人們則“笑貧不笑娼”。另如在社會主義國家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要知識分子這種“毛”附在工人階級的“皮”上。這些社會習俗常常引起儒生之強烈不滿。因為儘管士子受盡“十年寒窗苦”，到頭來無非一介寒士、兩袖清風，少數人雖可能“學而優則仕”，大多數始終是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斯文乞兒”。而有些人靠著人類自古以來的天然職業——“男盜女娼”，居然出人頭地而成帝王或豪富。不過人世間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知識分子既飽讀聖賢之書，自當瞭解人類社會發展之規律，切勿自暴自棄、妄自菲薄。須知過往數十上百萬年來，倘無腦力勞動者之孜孜研究與發明，人類將不知變成何物，更談不上達到爾今之高度文明。至於將來，人類在經歷長期的爾虞吾詐、你爭我奪之後，可能會逐漸擺脫獸性，進入以科技文明為標誌的社會，屆時社會的全體成員

均具有普遍高尚的文明水準，而其中“道德、文章”兼優的有識之士自然會成為“主人翁”！

(二〇)未來：余早已聲明，自己實無意充當人類命運之預言家，更不敢以救世主自居。唯將上述問題一一涉獵之後，一種對人類未來的好奇之心愈益不可遏制。人類的一切事業某種意義上都可謂之“探險”：賽跑運動員在烈日炎炎之下汗流浹背地反覆跑動，為的無非是將百公尺跑的紀錄刷新哪怕0.01秒；登山者為了攀上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甘冒終身殘廢乃至頃即喪生之危險；古代無數高僧走過上無飛鳥、下無走獸之流沙地帶，翻越冬夏常雪、百壁千仞之蔥嶺，為的是前往印度訪求佛教真理；許多女教師情願放棄城市的繁華生活，將自己的寶貴青春消耗在邊遠鄉村的課堂上，她們真正做到“桃李滿天下”，一些國際知名的科學家正是經其循循善誘的啟蒙而步向人生；宇宙航行員寧嚐人間嚐不到的苦頭，勇敢地奔向太空，為的是將人類的成就銘記在浩瀚無際的宇宙之中！余生亦晚，余志亦短，未能在社會大動盪之中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不過在前半生卻也扮演過許多不同的角色，做過賽跑運動員，當過拖拉機手、康拜因手，經過商，也作過教員、編輯，它們對自己的“探險”和“競賽”精神確實大有助益。既然敝人終於以歷史研究為職業，遂決定本著“科學無禁區”之原則，在古往今來的人類歷史之遼闊領域內廣泛地馳騁。職是之故，余斗膽就人類未來的下列問題，發表一點淺見，謬誤之處敬請一切有識之士理而董之：

1. 生產：關於人類的生產方式，過去大家多半注意物質生活資料之生產，而對人類自身之生產則較忽略。蓋前者在近數千年來出現顯著的變化，由石器而銅器、鐵器，由蒸汽機到電氣化、電子化……，使人們的衣食住行取得驚人的長足進步。而後者之發展往往要經歷數萬乃至數十上百萬年，它雖對人類之家庭、所有制及國家社會產生深刻的無可比擬之影響，唯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其變化卻極不顯著，因而難以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茲就此兩方面，對人類未來略加

推測：

(1) 人生產物：比起原始時代之採集和用石器狩獵，現代社會之物質生產自有天壤之別。即以文化傳播方式而言，從遠古刻在泥、石、甲、骨、竹、木、陶、銅上的文字，到絹帛書、羊皮書，到印在紙上的書籍，人類無疑是取得可觀之進步。不過今天看來書籍也是太過笨重了，相信不久將來一定會被各種顯微的膠捲及錄像、錄字、錄音帶所逐漸取代。未來人類之物質生產，比較富有進取精神的冒險事業自是飛向太空，探測無窮的蒼穹，不過囿於人類的智慧之最高限度，可能無法完全認識宇宙。猶如以目前人類肉體的最高限度，一百公尺跑難以達到九秒，至於將來如採用人造人或機器人，體力、腦力取得突破性的進步，那又當別論了。同時，未來人類在地球上繼續向高山、地層、海洋進軍方面，尚有大量工作可作。譬如將來若能在工廠的車間內生產農作物，不受天氣、季節所限，真正實現農業生產工業化，則產品和財富自會極大地豐富。屆時人類將主要考慮全面發展自己之才能，尤其是智力。順便一說，長期以來人類花在吃飯的精力和耗在睡覺的時間均嫌稍多、稍長，如果將來每日只要定期服食某種“營養丸”(分半小時、一小時、二小時、四小時……)而不感飢餓並有益身體，如果將來人們只要睡上一兩小時即可不感疲倦並保持精力充沛，那麼人們就可將烹飪食物列為每周或每月一次的高級享受，他們也就不必使一生的三分之一時間處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之中了。

(2) 人生產人：乍看起來，人類自身之生產(即蕃衍)方式，比之動物似無多大進步。例如雌雄交合而由女性生產，嬰兒誕生時頭腦空空如也，無法承繼祖先早已取得的文明思想，一切仍須從頭學起，一旦失去學習的環境與機會，照樣會過著猶如禽獸的野蠻生活。不過倘若細緻觀察、認真思考，不難發現人生產人之方式經過一二百萬年漫長之歷程，已發生了緩慢但卻深刻的質變。無數痛苦的歲月與經驗，使人們懂得雜交、血緣婚等之嚴重危害，從而逐漸過渡到家庭和一夫一妻制之產生。長期以來，人類為了使下一代正常蕃衍並承繼祖先文

明，想盡了一切辦法，社會、學校、家庭大力配合以完善教育制度，發明了各種避孕、人工受孕方法。最近由於科學的高度發展，使“人造人”（非“人產人”）這一命題已經或即將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從前有些夫婦因一方或雙方喪失生育能力，可以由別人代勞而成孕或乾脆領養嬰兒。現在因解決體外的人工受孕技術問題、出現試管嬰兒，於是就有借腹生子的現象，提供子宮作為營養溫箱而代人生子的母親被稱為“代母”（Surrogate Mother）。既然目前有“試管嬰兒”，將來就可能出現“溫箱嬰兒”，此溫箱不必非母體不可，即可在人體之外解決從受孕到胎兒正式出生的全部問題。屆時人類就進入“人造人”之新紀元，婦女徹底解除從“始祖”夏娃承受而來的“原罪”，再也不必生兒育女了，生母、代母、養母、奶母等等名詞之區別恐不會被人認真對待了。人們可選擇最佳精子、卵子以成孕，真正實行許多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優生理想。

2. 公有：在六千年前文明時代出現以前，人類曾經歷了數十上百萬年的原始公有制時期，那時人們極端需要集體互助以對待野獸和自然界，加上生產力甚低，缺乏剩餘產品可供私人佔有。然而隨著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家庭的出現，人們便產生一種為家庭傳宗接代、為後代佔有財產的私有觀念，於是逐漸出現了私有制及保護私有財產的國家、法律、軍隊等等。數千年來私有制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曾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一些人並因而創造宗教或領導民變，希圖建立人間或天上的平等王國。其最近之顯著例子，應推十九世紀中葉德國馬克思、恩格斯所創造的社會主義。唯馬、恩幻想通過工人階級的暴力革命一舉消滅人世間之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卻顯得遙遙無期。竊謂私有制之結束似為一個漫長的過程，它既因家庭之產生而產生，亦將因家庭之消滅而消滅。試想，當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之際，人們亦毋需拚命賺錢給子孫留下，何必為金錢而搞得自己廢寢忘食、頭昏腦脹、神不守舍呢？！蓋任何事業如果過分執著地追求，都可能“走火入魔”，練武如此，寫作如此，賽馬如此，賺錢亦是如此。

有些富翁本已夠富，卻還為著使金錢“蕃衍”而徹夜難眠，倒不如那些不知金錢為何物的達觀之士。倘若將來沒有家庭及子女繼承財產之壓力或動力，私有制之逐漸消亡應是順理成章之事。

然則家庭能夠消滅嗎？世上任何事物常易經歷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拙以為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無家庭——有家庭——無家庭亦是如此，不過最後之公有制、無家庭比之原始時期，高低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前已述過，家庭、一夫一妻制對於原始之雜交、血緣婚，無疑是一個革命。不過它們對於人類的性的慾望又是一種阻遏。本來人的性的要求，同衣、食、住、行一樣都是自然的慾望，應有自由選擇之權利，唯因男女婚配牽涉到二者乃至第三者，既要尊重配偶之願望、感情，又要承擔對子女的撫、養之責任，於是人類乃實行自我限制，對自然的性衝動來一個反動。但矯枉過正，實行數千年的一夫一妻婚姻伴隨著無數的離婚、私奔、婚外情，避孕方法之發明方便了非婚同居，絕育、獨身主義、性解放、天體主義等甚囂塵上。雖然愛滋病(AIDS)之流行對於性濫交不啻當頭棒喝，但進兩步、退一步，將來肯定會發明治療或免疫之特效藥。既然避孕絕對可靠而體外造人又成了可能，男女之間的結合將不必再考慮第三者(子女)之問題了。他們二者的關係，也將以高度的愛情即雙方完全自願為基礎，至於一廂情願而得不到滿足者可以訴諸社會，取得有似婚姻介紹所之類機構的協助。我們自然衷心希望人們在生活中能經常享受一種家庭式的溫馨，不過這種溫馨將來也許要更多地從社會整體而獲得。無情的事實是，在社會發展越先進的地區，舊式家庭的親情就越淡薄。歷史是不能戴著玫瑰色的眼鏡來觀察的，過去它曾伴隨著可怖的暴力和無數人的血、汗而發展，未來它或許將伴隨著無數痛惜家庭的老年人之眼淚而繼續前進。

總之，若果將來家庭真的趨於滅亡，人們佔據私有財產之莫大動力將隨之消失，社會可能再度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一切公有”的口號。屆時人的一切都由社會來安排：社會造人，社會托兒，社會教

育，社會就業，社會養老，社會送終。

3. 動力：對於未來社會生產力之高度發展，人們目前大概不會有多少懷疑的了，因為地球上之奧秘幾已暴露無遺，人類身體之各項機能不僅充足發展（譬如通過體育競賽等），且經由諸多機器而得到延伸，現在人類已進入向宇宙進軍的偉大時代。可是，一提及未來社會能否重行公有制，不免疑竇叢生。疑慮之一是：如果一切公有，人們衣食住行全靠社會，競爭消除，個人奮鬥動力就喪失了，而沒有競爭肯定不會有發展與進步。此種看法自不無道理，因為科學家發現有些在溫暖和平環境下成長的魚類，其機能同始祖魚並無太大區別；人們更親自觀察、發現或經歷到，有些生產力低下的國家不合潮流地實行“吃大鍋飯”的“公有制”，結果“一大二空”、“一窮二白”、“一平二調”等等就成了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實即小農平均主義或社會封建主義）的特點，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拙以為，一個社會沒有競爭固然不會進步，唯競爭過分殘酷，也會阻礙進步，因為它未能調動極大多數人的全部聰明才智，使群眾成了“群氓”。在生產力低下的社會，進步的動力在於競爭，而且根本無法避免殘酷的競爭。但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社會，進步的動力將由殘酷的競爭逐漸轉變為公平的競賽。其實，人們經常參觀或置身其中的運動場，本來就是人類未來社會的一個縮影，或可供借鑑的明鏡。千千萬萬運動員，根據一種公平的競賽規則，展開激烈的比賽，非分個高下不可，許許多多運動紀錄就是這樣被一再刷新的。在比賽之前，誰都不服誰，因為孰優孰劣只有比過方知，過早膽怯認輸決非英雄行為，亦不符競賽之真諦。通過比賽，對於真正的優勝者，必須口服心服，然後抱著“下次再見再賽”的精神，各自回去重新苦練。必須指出，無論體壇或武林、文壇之競賽，抱著“不服輸”、“下次再比”的態度不能說是“狂妄”、“不謙虛”，因為無此“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就不會出現“長江後浪推前浪”。不過一切後生晚輩若欲真正出人頭地，就必須認真學習他人之經驗，學習敬老尊賢。反之，一切真正

有成就的優勝者或老前輩，也肯定會提携後進、共同前進。以學問而言，對待前人創業、他人批評及後生晚輩之態度，往往是衡量一個人有否真學問的標誌，因為真有學問者深知學問非到他為止。因此，他對前輩是“開創之功實不可沒”，對同輩是“三人同行必有吾師”，對後輩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自己則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此外，參加比賽的無論任何人都必須嚴格執行競賽規則，嚴禁有意之“犯規”，尤忌用“下三濫”之手法來損害對手之身心。自古迄今，體育競賽雖甚激烈，但人們並不覺得其殘酷，而且各項成績一直在不斷發展。也許它正是過去大同社會的一項良好之遺留（人們由競相狩獵而實行比賽體能），也許它乃過去私有社會殘酷競爭的一種平衡和調節（如古希臘在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諸邦戰爭一律停止），不過它很可能成為未來新的大同社會的一種模式。將來鼓舞人們競賽的動力，可能包括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追求人們愛戴的榮譽感，以及為了獲取應份所得的各種獎勵（包括旅遊、休假及其他物質獎品），等等。

4. 道德：對未來大同社會的另一可能之疑慮是：社會或可實現公正和平，然人之初“性本惡”，一生下來“有奶便是娘”，將來若有人不遵守公共規定而奸、殺、淫、掠，破壞社會之安寧，人們又如何區處之？其實，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一方面，當社會的生產力達到某一高度時，必有其相應之文明、道德，而某些罪行亦會因而漸次消失。例如現今之歐、美國家乃至香港社會，許多民眾已習慣於不隨地吐痰、不搶佔車座、不破壞輪候以及在公共場所不違禁抽煙等。由於物質產品豐富，搶購商品、物資較少，盜賊們也不太常去“光顧”其他個人的手錶、照相機、錄音機或電視機，因為這些都已成了最起碼、極普通的消費品了。如果成人的思想境界逐漸高尚，必然會深刻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則未來人類的文明將一代代地有所改觀。既然嬰兒生下來便食公共的“奶”，那麼社會便成了他們最親的“娘”。另一方面，社會實現大同之後，目前國家之職能定會有所變更，尤其是鎮壓、作戰等暴力方面，不過國家原有之管理職能將會大大完善起來。新的社

會管理機構將根據人們當時的道德水準、文明程度，不斷相應地制訂各種法律或行為準則，至於其強迫程度大小也會相應調整，一切以維護社會安寧和平公正為最高標準。

當然，人們之間的問題並非全憑法律可以解決。即以現今社會來說，有些人的所作所為並未犯法，法律對之實無可奈何，然其不良作為卻常受輿論的譴責。到了未來社會，輿論之壓力將越來越發揮其無形的威懾作用。我們絕不能輕視這種“不成文法”的極大威力，須知在成文法律出現之前，人類社會曾有數十萬年是依靠不成文法來維持秩序的。倘若一個人犯下對集體不利的罪而被部落所驅逐，對他來說此種“自外於人群”的宣判不知要比後來的死刑要痛苦多少倍。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號召人人維護環境之清潔，使全港成為“人見人愛”、名副其實的東方明珠，如果有人亂扔垃圾、隨地吐痰，往往會立即感到“人見人憎”的尷尬場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尚且如此，那麼一百年後、一千年後呢，或者以歷史長河的標尺計算，更遠一些時間之後呢？

5. 大同：每當從香港電視的熒幕看到追捕、審訊、押解、驅逐“非法入境者”的鏡頭，自己的內心總是難以平靜。同是“移民”，合法者自是幸運兒，非法者只好自歎命薄。然不論合法、非法，這類移民者均屬自願，其衷心願望無非追求美好生活和民主自由，或者希圖換換環境以便改變命運。一般來說，移民浪潮總是由落後地區向先進地區、由貧窮地區向富裕地區、由專制地區向自由地區波動的。一個充滿專制、貧困的落後地區，儘管禁止“人材外流”，但潮流往往難以人為地加以阻遏。反之，比較自由的富裕地區，通常總是“人材薈萃”、人流洶湧而至，而在社會生產力尚未發展到應付裕如的情況下，只好對新移民之入境多方加以限制，以求保證原住民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減少人口膨脹之壓力。原來當今世上的“遷徙自由”都是相對的，只限於本國本土之民，而禁止他國之人“分一杯羹”，包括目前最自由的、被各國青年視為“聖地”的美國亦莫能外。

有時候，自己不禁懷念起歷史上可以自由遷徙的時代來，彼時進入別國無需手持甚麼護照或入境證，亦不用隨身攜帶甚麼身分證。不過歷史自不能逆轉，況當時國際之遷徙或有某種“自由”，但人們在各處之生活卻不太自由。例如東方國家厲行“保甲制”，其他一些國家採用“檔案制”，目的均為對付當地之居民。今日之中國大陸，雖熱烈歡迎海外人士自由前往定居，但它對居民之管理恐非一時所能適應，其制度實集中外之大成，包括源自中國古代保甲制的城鎮街道、農村公社管理制（專管居民及下了班的工作人員），以及源自蘇俄檔案制的幹部人事管理制（專管上班的工作人員）。每個幹部不論到何處工作，“個人檔案”必如影隨形地跟著轉移。每個居民不論住在何方，都時刻可能受到街道、公社的管理人員及“積極分子”之盤查。一句話，一個人在每天廿四小時之內，都在被管理之中。這樣看來，歡迎的地方不願去，想去的地方卻未必受歡迎，於是“何處是樂土”之感念重新浮現在腦際。

在懷念、感歎之餘，余乃將希望再度寄託於未來。余切望，在未來的大同社會，寰宇諸洲將真正出現民族之大融合，實行遷徙之大自由！目前各地銀行到處宣傳“一卡傍身，世界通行”，此予自己頗大之啟發。當然，在數萬或數十萬年之後，全球人類之膚色、民族、語文有可能趨於融合、不分軒輊，唯此前或曾經歷這樣一個階段：全世界人民自由平等博愛共和民主聯合國在各大洲遍設十分完善的電腦系統管理網，任何人只要憑傍身之一卡（Card），即可到處旅遊、居住、工作和生活。這一張卡記錄了下列的個人資料：姓名（或代號），性別，年齡，籍貫，膚色，身高，愛好特長，文化程度，所識語文，業務水平，所任職務，發表著作，所製產品，所創財富，儲存價值，以及個人之詳盡履歷。一個人持有此卡，到了任何一處都可找管理系統，聲明此行目的及居住時間，如純屬旅遊，則一切膳宿、聘請翻譯或導遊及其他費用均由其儲存價值扣除，如參加工作便由管理處根據其願望及技能加以安排，所創價值則儲存起來。總之，個人的一切新

資料(包括學歷、技能、收支)將隨時通過電腦輸入卡中，這一張卡即充分體現了“各盡所能，各得其所”、“五洲七海，自由通行”之精神。為了等候此日之到來，人類也許還得吃些頗大的苦頭。但人類既然號稱“萬物之靈”，其發明的科學技術較之其他動物確實不啻天淵之別，那吾人就有理由相信，人終有一日會徹底擺脫獸性、完全脫離動物界，除非地球自我爆炸，或者與某個星球相撞，又或者被外星人徹底毀滅。不過這一天究竟何時方臨，一萬年後？十萬、八萬年後？反正吾人此輩是望不到了，但我們的子子孫孫將會拭目以待的。

*

*

*

前面我們將古今中外有關歷史、現狀及未來的若干重大問題，均置此《〈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序論》中加以濃縮，未免有東拉西扯、離題萬里之嫌。唯筆者此舉要在強調指出，欲認真研究古代中國之歷史、得出符合事實和邏輯的結論，不能像從前一些國粹派那樣始終只從“廿五史”之中討生活，而必須綜觀中外、貫串古今，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表面上似為一代接一代興、治、盛、衰、亂、亡的不斷重覆，然在這諸家王朝興亡史背後卻掩蓋著一個最本質的全局性問題：長期以來，中國總是維持著統一的專制獨裁的中央集權體制。它雖不斷被民變所衝擊，然又不斷地一再重建。歷史上雖亦出現過分裂割據紛爭，但最後總是迅速地回復到中央集權之大一統。這是一個千古之謎，它好像埃及的金字塔(pyramid)、獅身人面像(sphinx)和巴比倫的懸空花園(Hanging Gardens)等古代奇跡，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它猶如古希臘諾薩斯(Knossos)的迷宮一樣，千門百室引人入勝。許多中外史家對此均懷著濃烈的興趣，煞費苦心必欲解決之而後快，可是古老中華帝國這謎一般的問題迄今猶未獲得正確的答案，始終令人夢繞魂際，百思而不得其解。

倘若吾人對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長期性、頑固性，未能有一個總體的通盤觀察，要合理論述歷代興治盛衰亂亡的因果關係，自是一件喫力不討好的事。不過如能對歷代情況先作個別、深入之分析，然後再綜合地予以研討，則對中國歷史全局性問題之解決應不無益處。但不論分析或綜合，均必須將古今中國置於一部世界通史的背景中來考察。余自知才疏學淺，缺乏足夠的史才、史學、史識以從事此等重大課題之研究，唯命運畢竟注定自己終日為歷史書籍而“爬格梳行”，故深願為此而略盡棉薄。下面就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長期性、頑固性和複雜性，提出若干相關之現象，且不管它們孰為因、孰為果，或者因、果兼而有之：

1. **河川的農業文明**：古代中國以發源於黃河流域的遠古文明而著稱於世，和兩河、尼羅河、印度河等流域同屬於“河川文明”。此種文明又被稱為“農業文化”。自古以來其居民圍繞大河附近之平原而生活，其周圍往往有山脈或沙漠作為屏障，或有遼闊的海洋阻互而成為孤立之陸土，其經濟以依賴河流灌溉的農業為主要產業。如果說希臘、羅馬等“海洋文明”利於商業、貿易、交流，富於開放、進取、冒險，那麼東方的“河川文明”則呈現另一種特點。從事農業以為生計者，全部心血均傾注於土地上，其命運端賴一年一季之收成，故居民雖勤勞、忍耐、安土、樂業，然亦不無保守、閉塞、孤立等習性。因此植根於大陸農業經濟基礎上之各種政治制度、社會組織、思想文化，亦往往呈現穩定、固守乃至僵化的特點，而大陸人口的絕大多數自是終身務農的居民。中國專制集權制度之長期性、頑固性應與此不無關係。

2. **孤立的內在系統**：長期以來，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形成自我孤立、唯我獨尊的格局，使這個“中華帝國”全境成了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內在封閉系統。在中國，一切以農業為基礎，忽視海外貿易（六朝及南宋等偏安王朝除外），其向外擴張亦以大陸本土為中心，局限於四裔之經略。蒙元時期雖有三次西征之舉，但它乃蒙古族游牧習

性的充分發揮，並非中國主體民族漢族的所作所為。至於明、清等代則多行海禁、閉關之政策，其間雖有鄭和之七下西洋，唯不脫傳統的“朝貢貿易”之窠臼，要在向海外諸國耀武揚威或換回寶貨。若謂美洲新大陸及東印度航路之發現，導源於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商業、航海傳統，導致了今日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發達；而比地理大發現至少早半個世紀的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結構並未帶來甚麼實質性的變化，其後朝廷依然厲行海禁，國家猶如死水一潭。

3. 停滯的自然經濟：中國古代的孤立、封閉系統，其基礎應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清初一些皇帝的敕諭，充分表明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使統治者的自給自守，達到何等狂妄的程度。如乾隆帝曾諭“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嘉慶帝也是一樣的口吻，謂“天朝富有四海，豈需爾小國些微貨物哉？”這種小農生產的自然經濟不僅造成長期的閉關、海禁，抑制了海外貿易的發展，而且也妨礙了農業生產及技術的自身進步。中國向來號稱“以農立國”，那種“男耕女織”的田園式風光成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業的象徵，卻也掩蓋了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本質。自漢迄近代，中國的農具使用、農耕技術和方法，一直停留在大體相同的水平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此中之原因固有很多，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同自然經濟停滯不前，這二者應係相輔相成、互為因果。

4. 傳統的重本抑末：所謂“本末”，係春秋戰國以後中國歷史上對經濟部門的劃分，“本”指農業（包括家庭紡織業），“末”原指奢侈品生產，後泛指工商業。自秦、漢以降，歷朝多實行“重本抑末”、“強本弱末”亦即“重農抑商”之政策。此對農業發展、民生安定固有作用，然卻有害於工商業之發展，最後反轉來亦不利於農業之進步。在這種政策下，全國經濟一切以農業為主，手工業為副。商業屬於“末作”、“末產”，而且主要限於國內，並受國家官僚機構之壟斷。至於以農業為主，則主要是發展糧食生產，使中國民眾滿足於“有飯吃”。從古到

今，中國的統治者都習慣於認為中國老百姓所需頗低，但求溫飽而已，政府的責任端在使農業維持一個好年成，因此農村最廣大的居民幾無商品消費可言。唯其如此，方能理解為何在中世紀同屬自給自足的經濟，西方的封建莊園後來卻發展出資本主義生產，而中國的城鄉卻千載如斯、一成不變，蓋中國的商品許多均由官家買賣以供皇室、達官們作為奢侈享受用，而絕大多數民眾的消費水平一直處於極端低下的程度。

5. **遭禁的奇技淫巧**：由於工商業屬於“末作”、“末事”，不僅奢侈品生產，而且一切科學技術均被歷代王朝視為“奇技淫巧”而加禁止。因此，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呈現畸形發展之狀況，一方面有領先於世界的造紙法、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等“四大發明”，另方面工商業的不發展卻使社會的科學技術基礎極為薄弱。西方古代的某些科技發明雖比中國遲，但後來工商業發展的要求卻導致產業革命和海外擴張，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奠下基礎。而中國的羅盤後來卻用於看風水的堪輿，火藥則以燃放節日鞭炮或焰火而有名。

6. **愚昧的官僚專制**：眾所周知，愚昧與專制乃密不可分之“夥伴”。在一個充滿文盲的農民之國度，要消滅國家壟斷、官僚主義是不可能的。古往今來，我們看到許多統治者如何在罪孽的揮霍之中耗盡祖國的脂膏，我們亦看到近代顛顛預預的官僚由於愚昧無知而將國家民族的權益拱手讓給外人。從“宋鼻涕”到“清邇邇”，官僚老爺們的喪權辱國似有一貫之傳統。今日這個問題亦不能說已經解決。“愛國”或“賣國”在不同時期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不變的永恆標準是：不符合廣大人民眾之最高利益？國家不是抽象、空洞的，人民就是祖國！如果說在清代，向列強割地賠款是為賣國，爾今卻略有改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列強之資本輸出已有變化，它們已不一定要落後國家割地或出賣主權（那極易招來反殖民化的鬥爭），卻希望亞、非各國居民稍稍富裕起來，好購買其高檔之商品（汽車、電器……），更力圖出貸其過剩之巨額資本。而某些國家官僚卻滿足於

“未割地”或在中外合資經營公司中佔51%之股份，就不算是喪權辱國。其實由於他們的愚昧無知，在簽署合同中讓列強賺了大錢，這種揮霍人民血汗的行為不是“賣國”又是甚麼？！至於那種慷人民之慨、不惜耗費巨資來豢養倒咬一口的毒蛇，或者用許諾利益來“贖買”領土、維持“面子”的做法，也是十足的愚蠢！

7. 強固的中央集權：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之頑固、強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這種政治制度自古迄今，歷經數千年而方興未艾。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封建置郡縣以來，經漢、唐兩代之發展，中央集權日益成為定局，及至宋代的強幹弱枝、明代的君主極權，又推向新的高峰。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切權力歸於中央，全國武裝由中央直接指揮，全國經濟受官僚壟斷，全國統治思想亦由中央決定。如若去除“家天下”、“黨天下”之區別而不論，則爾今之中央集權實集歷代之大成，不僅國家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由中央所強力控制，即使人們的家庭、思想亦無不統制於最高領導集團。由於一切大權集於中央，又無良好之法制，倘如皇帝或最高領導人處於昏聩、無能或年老糊塗的狀態，全國政局實不堪聞問。至於邊遠地區，則盛行“山高皇帝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吏治腐敗是必然的。

8. 軟弱的地方力量：中央集權強大的另一反面，往往是地方之無權與軟弱。由於大權集於中央，地方的一切都被統死了，未能發揮各自的主動性，自也談不上彼此之競爭。在中國歷史上，曾有幾個時期是分裂割據的，例如春秋戰國、三國、東晉和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宋遼金夏等等。表面上看，這些時期缺乏漢、唐、明、清那樣全國一統的盛世，然如認真加以考察，彼時之經濟並未停滯，各地反而有所發展。春秋戰國時代鐵製農具之廣泛使用、水利工程之大量興修、思想言論之自由活躍，六朝時江南一帶的大力開發，五代十國時南方經濟的普遍繁榮，宋代時海外貿易之興盛，這些在歷史上均有定評。至若近代以來，台灣經濟的日益欣欣向榮，似也可提供另一明證：地方自治、分立，比之受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桎梏，對經濟、政

治、文化之發展利多而害少。可惜，中國的歷史傳統是長期的絕對的大一統，中央集權佔盡優勢，缺乏地方之間的各自發展和有力競爭。

9. **懸殊的上下差距：**中國民族(尤其是漢族)歷史的特點除了中央高度集權和地方極端無權之外，還表現為上層與下層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差距之懸殊。誠然，中國缺乏希臘、羅馬那樣發達的古代奴隸制以及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乍看起來中國農民的生活境況與人身自由程度似乎高些，其實情形並非完全如此。希臘、羅馬的奴隸之地位固極低下，但在自由民中，貴族與平民之差距似不比中國大，是故希臘有雅典之類的古代民主制，羅馬則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之先聲。羅馬帝國是被蠻族所摧毀的，隨著奴隸、隸農和後來農奴之解放，歐西國家上下層的文化水準及生活程度乃比東方國家接近，而舉族一致的民族、國家在文明發展方面自較易奏效。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一般均以華夏民族即漢族為核心而發展，中國農民表面自由，其實其遭遇並不如歐洲古代的隸農、農奴好多少，他們數千年來所忍受的非人待遇，同帝皇、貴族人們的奢侈享受相較，實有天壤之別。這種懸殊的上下差距直到近代仍明顯地表露出來，如文革期間揭發最高官員之享受，同少數民族地區最窮農民之生活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表面上最高工資約500元，比大學畢業生多十倍左右，其實最高主席的衣食住行全由國家“包乾”，他的光輝著作亦由國家保證出版並強行推銷，然後其稿費照收不誤。這樣，思想武器便轉化成物質力量：思想的光環充滿了黃金的光輝。

10. **簡陋的物質要求：**中國農民地位之低下尤其表現在，他們的物質要求簡直已被降到人類最簡陋的水平上。歐洲古代的奴隸、農奴之待遇自是悲慘，唯以自由民而論，羅馬人(包括貴族、平民在內)實是講究享受、娛樂之民族，他們不論貧富都喜歡到公共浴場去消磨每天餘暇的時光，他們酷好賽馬、角鬥等瘋狂的娛樂。也許是通商致富成為其追求生活享受的重要動力吧。中國古代帝王、貴族之奢侈並不比希臘、羅馬差，但平民之生活水準卻不可同日而語，謂予不信，可

將古今中外加以比較。俄國十月革命時，究竟是甚麼生活景況使人民難以忍受，據有些作家加以典型概括，是為“黑麵包乾”。在現代波蘭，麵包漲價可促使人們立即走上街頭！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次數、規模在世上雖絕無其匹，然若非到了吃野菜、啃樹皮或易子而食之田地，農民是不會鋌而走險的。“知足常樂”向被形容為中國人的標準座右銘。以現代士子而論，試想有幾個國家的大學畢業生能忍受二十年不提薪金（比同齡普通工人還少得多）、二十年與配偶分居兩地不得團圓？即使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夫妻如分開兩個月恐也早已被視為“苦差使”了。

11. 壓抑的人性價值：中國人物質要求之所以如此簡陋，自然不是他們不懂得享受，他們能夠長期忍耐、委屈，是不得不如此的。蓋專制主義之壓迫過於強大，人性的價值長期被壓抑、被遏制，非到忍無可忍（吃野菜、啃樹皮）則忍之、受之。目前，隨著現代世界自由民主精神的傳播，人們起而抗爭的忍耐水準線，似略有提高，但數千年來的壓制傳統一時則難有根本扭轉。在中國，衡量人性的價值及其高低標準，是不能單由法律條文來觀察的。因為在一個“人治”代替“法治”、“有法等於無法”的國度，農民表面上比別國隸農、農奴自由，實則更加不如。以現代而言，一個國家的“主人翁”，比別國資本家手下的“僱工”，其自由、富裕程度不知要相差多少。儘管法律規定有言論、出版之自由，但同時又規定在行為上必須堅持一些“原則”，如果有人發表反對這些“原則”的言論或文章，是否被視為反動的行為呢？若然，人的價值究竟還剩多少斤兩呢？！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有數十萬人因言論或思想“反動”而被劃為“右派”，今日除少數“極右”分子外，其餘均已宣佈為錯劃而平反。即使這少數人是真右派，然為他們而使數十萬人陪綁，這樣的運動難道不應完全否定嗎？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尚且如此，古代更可想而知。

12. 膨脹的人口壓力：過多的人口或不一定與專制、集權有關，然應與生活之貧富有關。中國今日之人口已突破十億之大關，然在大

清以前並未聞破億的，據載明代最多為六千餘萬。是否有清一代中國人口才出現較大的發展，余對此向有疑竇，心想若論盛朝則有漢、唐、明、清，清代之生產、生活、科技與前並無根本之改變，況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於前，即使經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恐也難望一下子使人口翻幾番，康熙時竟近三億、道光時破四億，此或前代人口統計不夠精確而使然。無論如何，人口眾多確為中國歷史上的一貫傳統，不過此特點倒不一定與富裕相連，反而可能與貧困有關。表面上看，生活優裕人口之生存率自高，故有的常常喜歡以人口之增長來證明自身制度之“優越性”。然無情的事實是，越窮生子越多：以國家論，歐美人口少，而亞、非人口多；以種族論，白種人口少，而黃、黑種繁殖多；以階層論，有識之士子女少，而農、工大眾子女多；以時期論，太平盛世人口不一定多，“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及文革期間人口反而增長。其故無他，蓋富裕者、有文化者希望生活更好，深知生養後輩所付出之代價極昂；而窮困者生活反正低下，多生幾個也花費無多、照樣養著，況且其節育等衛生知識自不會多。總之，窮則多子，多子更窮。這樣，膨脹的人口壓力與中國長期停滯、落後竟不似毫無關聯了。

13. 頻繁的農民暴動：前已道及，中國農民暴動的次數、規模及激烈程度在世界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此與中國專制制度統治之漫長、酷烈，往往是互為因果的。歷代王朝的殘酷壓迫，以及廣大民眾所受的非人待遇，促使民變一次次地爆發，然而結果帶來的往往是更加長期、酷烈的壓迫。因此不能單憑一次民變的規模大小和激烈與否，就判斷該次民變是否“徹底”或值得肯定。從世界史來看，法國革命表面上似比英國徹底，但後者首先消滅小農經濟、實現產業革命，結果最早走上自由化、工業化之路，而前者在革命中把土地分給農民，結果卻須經更加長期、曲折之路方達到英國走過的道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須經之路遠比法國為長。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民變應加具體分析，有些有利於打擊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有些雖打擊專制卻

造成不小的破壞，有些反而使專制極權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職是之故，不能片面地對歷史上的農民起事一味歌頌，更不要將農民戰爭史作為“光榮”而到處誇耀。須知每一次具有所謂“偉大歷史意義”的激烈農民暴動背後，都充滿著萬千民眾辛酸的血淚汗。1976年“四五”天安門革命曾捲進了百萬民眾，而其背景正是億萬人民十年乃至二十年積累起來的血淚汗，不過是次民變已喊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如能循此以進，則中國消滅小農經濟、鏟除封建官僚專制影響有望矣。

14. **更迭的改朝換代：**對於歷史上的民變之所以不能盲目歌頌或一味肯定，其重要原因之一乃它們帶來的只是更迭的改朝換代。綜觀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興亡史，無論貴族革命、宮廷政變或平民起事，其結果均是一個王朝的消滅、重建或另一王朝的新興。吾人可否因為取代者是貴族上層或平民下層，就據此而加以肯定或否定呢？不可。要肯定一次革命、政變、起事、改革或暴動，不能僅憑發動者的出身或其打出的旗號、向民眾許下的諾言，而必須站在中外古今歷史之高度上來加以評判，視其對中國歷史有無推動作用或作用之大小。有些貴族（包括少數民族）通過政變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對社會經濟之發展頗有貢獻。而有些農民戰爭之領袖雖然暫時打亂了舊的地主統治，但他們卻以新地主的面孔出現而大肆掠奪，其兇殘、專制、極權甚至遠遠超過從前的地主。似此廣大民眾更換新統治者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比政權的較為和平的過渡要高出許多，而更換後政治、經濟管理的延續性、穩定性卻大受破壞。我們並非主張貴族革命、宮廷政變一定優於農民暴動，有些宮廷政變也帶來極大的破壞。但無論如何，政變、民變等等及其之後的改朝換代，均是中國長期專制極權制度必然導致的基本模式。

15. **穩定的長治王朝：**中國歷代之王朝不在少數，但自統一中央集權制確立以來，能稱得上穩定的長治王朝並不多，一般認為漢、唐、明、清才可算是盛朝。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大王朝都出現在大

規模的民變之後：西漢建於秦末農民起義後，東漢建於新末農民起義後；唐朝產生於隋末農民戰爭之後；明朝成立於元末農民起義之後；清朝出現在明末農民戰爭之後。論史者一般認為，大型農民戰爭徹底打垮了舊的王朝統治，掃蕩了舊體系的污泥濁水，全國出現了新的權力真空，一時間再也沒有另一股勢力可以取代新政權的建立者，於是天下太平，乃有盛朝之出現。此論自不無道理，不僅適合於歷史上的“家天下”，也可推算於後來的“黨天下”。唯這種穩定的長治王朝之建立，對中國歷史的利弊如何，倒是值得探索之問題。蓋新王朝建立之初，或會出現“新官上任三把火”之局面，然不用很久由於其統治穩固、缺乏競爭，為了使其子孫千秋萬代繼承權勢，必然要加強對民眾的控制與鎮壓，拚命發展中央專制集權，從而形成“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而一個王朝統治越久，猶如一個已屆風燭殘年之老人仍在勉為其難地領導一個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或十億人口的國度一般，必然出現吏治敗壞、奢侈腐化、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等等現象，遂至病入膏肓、萬劫不復。唯其如此，歷史上的女人干政、宦官擅權、朋黨之爭、權臣作亂、軍人混戰以及民變迭起，在上述盛朝屢見不鮮。故農民戰爭後出現的長治王朝在加強專制集權、助長社會腐敗這方面的作用，亦不容忽視。

16. 短暫的分裂割據：中國俗語雖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唯中國歷史之主流似為中央集權專制之大一統，而非分裂割據和獨立。一句話，合較長久而分卻短暫。分裂的時期有西周後的春秋戰國，東漢以後的三國，西晉後的十六國、東晉以及南北朝，唐以後的五代十國，宋時的遼、金、夏，清以後的軍閥混戰等等。本來眾多地區各自立國或行政，可以收互相競爭之效，如果彼此相安而無頻繁的戰爭，對於經濟、文化之發展是有利的。獨立小國便於充分利用本地之資源、發揮人材之能力，為了自身之生存亦使統治者兢兢業業、不敢稍有懈怠。中國在春秋戰國、五代十國等時期發展之事實，以及和中國面積相當的歐洲之分為數十小國，都說明小國寡民未必劣於一統大

國。不過中國分裂割據的時間總起來比大一統要短些，也正是這種傳統限制了地方積極性的發揮，使中國長期墮入專制集權之深淵而萬劫難復。當然，人類發展的潮流是獨立、自由，許多事物都從大變小，家庭如此，國家似亦如此。也許終有一日，全體華裔子女終可擺脫十億大家庭年邁家長的統制，而稍稍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

17. **獨尊的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曾出現過“百家爭鳴”的思想自由發展之黃金時代。但自六國被秦所滅，全國政治固然一統，民眾思想亦逐漸被統制、禁錮。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開全國思想統制風氣之先，法家學說一度甚囂塵上。到了西漢，經過短暫的道家“無為而治”，至武帝時乃“獨尊儒術”，從此全國思想定於一尊，孔孟之道獨步於世兩千載。儒學雖以“仁義”、“禮治”為核心，但早已滲入法家等說。它大力鼓吹“君權神授”、“忠君”、“大一統”等，含有對民眾、軟硬兼施而治之思想，對鞏固中央皇權起了頗大之作用。辛亥革命以後，隨著“家天下”之消滅，儒學再也無復昔日的統治地位，而先後被三民主義、社會主義所取代，足見儒學和中央皇權之統治休戚相關、生死與共。其實不僅是中國，西方國家凡是實行獨裁統治的，無不採用寬猛並濟、恩威兼施的。一句話，總是鐵血、大棒和胡蘿蔔同時使用。今日之東方國家，仍然盛行以某種思想作為欽定的全國指導思想，這種作法不利於經濟、文化之自由發展，最後終將如同儒學一樣被送進歷史之博物館。因為一種制度或思想是否優越，決非自吹自擂自封所可證明，真正優秀的思想是不怕其他思想競爭的。在思想領域內切忌採取壟斷的辦法，如此則中國幸甚。

18. **冥頑的皇權主義**：在中國民眾尤其是億萬農民的腦海中，長期以來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一種皇權主義思想。其特徵即對於皇權、皇帝及其生活充滿著近乎神秘的崇敬，即使在末代皇帝消失後，對於新的國家領導人也仍然視之如同帝王一般。在歷史上，許多農民儘管揭竿而起，鋌而走險，但往往“反對地主，擁護好皇帝”，就算自己掌握政權，也把如何當好皇帝作為最高的政治模式。這種冥頑的皇權主義

自是千百年來中央集權制度所致，也是儒家所宣揚的“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之類的影響，但它又反過來起到鞏固中央王朝專制集權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偏遠地區許多農民還在講“今次皇上做得好！”他們根本不知道末代皇帝早已不存在了，仍把今天的最高領導人視若“今上”。這也難怪，不用說農民缺乏文化，許多領導人雖不乏知識但其所為亦不脫皇權主義之窠臼。例如，古代除非皇帝自下“罪己詔”，旁人是不准非議“今上”的，今日人們仍習慣於認為最高元首一切正確，其思想必須永遠堅持，凡是其思想中的錯誤部分都不能算是他的思想，至於政治的罪責則往往推給干政的女人或亂政的“奸臣”。此種皇權主義只要一日陰魂不散，則中國欲進步難矣哉！

19. **禁錮的宗法體系**：除了皇權之外，自古迄今中國人之行為亦常受宗法體系之禁錮。宗法制度本由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在周代趨於完備，係以天子為中心、按血緣關係組織起來、維護封建世襲權利的一種家族制度。當年周公大行宗法制，原欲以之維繫封建制度，後來分封制雖趨瓦解，然宗法制一直保留下來，歷二三千年而不息，它對中國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確實起了輔助之作用，具有不容低估的深遠影響。這種制度養成了中國人強烈的宗教觀念，注重忠孝合一的人倫關係，也促進了父權、男權至上的流行，對思想自由、人材造就往往加以束縛。今日之歐美各國，所謂“獨立即孤獨”、“自由即自己”之風頗盛，“二人世界”或“獨身主義”流行。而在中國，那種“數世同堂”的大家庭觀念還有相當的市場，以親情代法律、裙帶之風仍大行其道，此與數千年來宗法體系之餘緒頗有關聯，它們對中國之長期存在專制實有莫大之助力。

20. **固守的民族性格**：提及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頗易引起爭端，因為和西方白種人相比，目前中國黃種人尚處在較為貧窮、愚昧、落後的階段，數千年來本族統治者的專制壓迫以及百多年來異族入侵者的欺負凌辱，使中國的人性蒙受一些嚴重的缺陷，例如狹隘無知、夜郎自大、幸災樂禍、怨富嘲窮、明哲保身等。誠然，吾人若真愛吾土

吾民，對自己民族性格的優劣理應採取分析的態度，切忌把億萬農民都視同擅長“精神勝利法”的阿Q，更不宜把全國人都貶為“醜陋”之民。蓋各國之人均有其“醜陋”之處，外國月亮自不會比中國圓。不過，如果對中國民族性格的固守性予以深入之研究，或可進一步瞭解此種性格同專制制度之長期性的密切關聯。長期發展農業的文化傳統，使中國廣大漢族人民具有勤苦、耐勞的一面，但也存在保守、閉塞、孤立的習性。守土、戀鄉是一切根源於“唐山”的“唐人”之通性。“安居樂業”、“知足常樂”幾乎成了中國人生活的基本準則。而從其中派生出來的容忍、順從，正是一個個專制王朝得以橫行霸道的重要因素之一。據總結，長期在“鐵幕”、“竹幕”下生活的百姓，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必須遵守下列之“十誡”：(1)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2) 倘若聞見，切勿思想；(3) 若已思想，切勿談論；(4) 若已說出，切勿書寫；(5) 若已寫作，切勿發表；(6) 倘若刊登，切勿署名；(7) 若已署名，收回更正；(8) 更改無效，痛哭流涕；(9) 檢討不行，低頭認罪；(10) 服罪期間，五體投地。此種趣論雖為好事者所創，然未免不是專制統治下的馴服工具之絕妙寫照。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吾土吾民豈可望乎？！

以上廿端，乃為參與“中國長期存在中央極權專制”問題討論而抒發，既不敢說點點有理、面面俱確，更未敢保證由點成面、由面到全體皆能自圓其說。不過，倘若有數端能站得住腳，則對全局性問題的解決當有助力。雖然局部論點和全局結論，往往會有因果不清或因果循環之情況，唯歷史發展並非孤立的，昨日之“因”成了今日之“果”，今日之“果”往往種下明日之“因”。對於中國歷史上长期的老大難問題，決非下一個簡單的結論就可以表演魔術般地解決的，它正是必須先對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諸方面從事精密研究，然後再加以綜合的分析，方可一步步趨於解決。在這一方面，既須有勇往直前、探索真理的膽識，又亟需謙虛謹慎、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於史學界前輩的成果，哪怕是一點一滴，都不要輕易地否定；對於可畏

的後生晚輩，則應熱誠地歡迎他們投身於戰鬥之中！

記得在七十年代末期，一位可敬的史學老前輩曾語重心長地說：治史數十載，唯經十年浩劫，方粗通一部“廿五史”，惜吾老矣哉！確實，博古可以通今，通今亦可察古，親歷一場現代政治運動，往往可以使畢生對於“正史不正”的諸多疑難一掃而光。作為治史者，余慶幸能有廿餘載之京華歲月，自始至終參加“史無前例”之“十年史”，又“忙裏偷閒”地將“廿六史”翻了一遍，兩相對照，總算對解決“廿七史”或“廿八史”（加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史”）的一些疑難問題略有體會，深感獲益匪淺。而最最幸運的是，在“十年”劫餘，余尚能拿得動筆，能在香江此岸自由地書史、論史，並且間或向歷史老大爺發發自己的牢騷以求其垂憐，運用其萬千載如一日的魔力添加自己的靈感。下面，余擬通過歷代王朝興亡史的具體評述，繼續參加對中國歷史大事的馬拉松式討論。

*

*

*

本書終於到殺青付梓的時候了，唯筆者並無往日完稿之際那種輕鬆的心情，反而有一種沉重的壓抑感。這是從思想、文字上清理古今數千年祖國歷史包袱必然會承受到的壓力，也是民族傳統良性和情性合力所捲起的洶湧波濤。中國的現在是中國過去的繼承，中國的未來也只能是中國現在的發展，此外別無奇跡可期。面對中國歷史老大難問題，多少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莫不扼腕歎息，深為吾土吾民命運多舛而黯然神傷。然則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傳統呢？對於故國河山及父老鄉親又該持何態度呢？愚以為對民族文化之優劣理應持分析的方法，既要發揚優良之傳統，又正視嚴重之缺陷。不過猶如醫療膿瘡、肉瘤一般，我們必須細心地除膿割瘤，以免傷害到其他健全的機體。一個人不但不能選擇生身的雙親之家庭，也不能選擇自己的祖

國、種族，但作為兒女自不會嫌棄父母貧窮、不應嘲笑鄉親的愚昧。因此，切忌把億萬農民都視同擅長“精神勝利法”的阿Q，更不宜把全中國人都貶為“醜陋”之民。黃河、長江孕育了中華民族之文明，吾人今日或有“河殤”之感，但“殤”的是數千年來專制主義統治傳統之酷烈，而並非黃土、黃水和黃皮膚。一個華裔可以選擇外國籍，操最流利的外國語，獲世界最高的獎賞，但他遍歷全球卻改變不了身上的黃皮膚，這是祖先、父母給予他的！至於“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答案也是肯定的，我們提倡“苦戀”祖國，並不是主張“愛屋及烏”，但是祖國——母親的土地 (Motherland) 永遠是關愛自己兒女的。在那滅絕人性的“十年”，祖國由於任人糟蹋、自顧不暇，似乎照料不到其億萬子民，一旦重新站立起來，她又會張開雙臂去擁抱、去撫愛！值得提出的問題倒是：你為祖國做了甚麼？愛祖國，就必須反對一切危害她、侮辱她的奸賊。愛祖國，就必須為她的民主、自由而大聲疾呼，就必須為她的繁榮、富強而切實地努力！作為炎黃後冑，讓我們世代為中華貢獻、貢獻、再貢獻！

是歲恰值“北京之春”10周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

“五四運動”70周年

法國大革命200周年

英國《權利法案》300周年

佳榮識於香江南冥齋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序論及結語，
香港學津書店1989年初版、2000年增訂版）